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中俄關係 20 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343-008-
執行期間：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

計畫主持人：郭武平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建豪
博士後研究：許菁芸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

中文摘要：50年代共黨社會主義兄弟中國與蘇聯關係初建，60年代就成為勢不兩立的對立衝突，直迄90年代始握手言和。近二十年來中俄關係已從友好的、建設性的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進入中俄前所未有之友好高峰期。實際上，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中俄的共識與利益匯集於對美國霸權的威脅，是一種對情勢的反應(re-active)而非主動(pro-active)解決雙邊潛在問題。由於美國對外戰略牽動中、俄關係的發展，中俄雙邊互動也影響著大國權力平衡關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本質除了有關平衡美國霸權外，既有的雙邊共識與追求利益張力似正影響著雙邊關係的發展。隨著美國單極的鬆動與中國的崛起，中俄關係逐漸偏離傳統權力平衡的意涵，轉為更為複雜的「機制化平衡」。因此，如從「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三大學派—權力、利益、認知三種不同面向的建制觀，去觀察二十年來的中俄關係，更能窺知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全貌。雖然「俄帝侵華史」已成為過去，但是中俄雙邊反覆多變的關係變遷，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本質的變化，以及未來中俄關係如何向前行，中俄雙邊將如何建構未來關係，都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

中文關鍵詞：中國、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國際建制、機制化平衡

英文摘要：In the 1950s the Communist partner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viet Union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 initially, turned into opposite in the 1960s and buried the hatchet in 1990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Sino-Russia relations have a friendly and constructive becom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 an unprecedented peak. Indeed,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is the collect of interest and consensus, facing to the threats of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s a kind of re-active to the situation instead of pro-active to resolve bilateral potential problems. The foreign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that bilateral interaction also affects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great powers. The Sino-Russia bilateral consensus and the tension of pursuing for the interests seem t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ch in addition to equilibrate United States hegemony. With loosening unipol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Sino-Russia relations

gradually devi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of balance of power to the complex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Therefore, bas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three schools—power, interest and identify observe twenty years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a better wa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Sino-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become a past, the variation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how to construct Sino-Russia relations forward to the future com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英文關鍵詞： China,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regim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中俄關係20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100-2410-H-343-008

執行期間：100年08月01日至101年10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郭武平

計畫參與人員：許菁芸(博士後研究)、黃建豪(兼任助理)

成果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得立即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俄關係 20 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中文摘要

50 年代共黨社會主義兄弟中國與蘇聯關係初建，60 年代就成為勢不兩立的對立衝突，直迄 90 年代始握手言和。近二十年來中俄關係已從友好的、建設性的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進入中俄前所未有之友好高峰期。實際上，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中俄的共識與利益匯集於對美國霸權的威脅，是一種對情勢的反應 (re-active) 而非主動 (pro-active) 解決雙邊潛在問題。由於美國對外戰略牽動中、俄關係的發展，中俄雙邊互動也影響著大國權力平衡關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本質除了有關平衡美國霸權外，既有的雙邊共識與追求利益張力似正影響著雙邊關係的發展。隨著美國單極的鬆動與中國的崛起，中俄關係逐漸偏離傳統權力平衡的意涵，轉為更為複雜的「機制化平衡」。因此，如從「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三大學派—權力、利益、認知三種不同面向的建制觀，去觀察二十年來的中俄關係，更能窺知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全貌。雖然「俄帝侵華史」已成為過去，但是中俄雙邊反覆多變的關係變遷，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本質的變化，以及未來中俄關係如何向前行，中俄雙邊將如何建構未來關係，都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

關鍵詞：中國、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國際建制、機制化平衡

Abstract

In the 1950s the Communist partner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viet Union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 initially, turned into opposite in the 1960s and buried the hatchet in 1990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Sino-Russia relations have a friendly and constructive becom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 an unprecedented peak. Indeed,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is the collect of interest and consensus, facing to the threats of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s a kind of re-active to the situation instead of pro-active to resolve bilateral potential problems. The foreign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that bilateral interaction also affects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great powers. The Sino-Russia bilateral consensus and the tension of pursuing for the interests seem t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ch in addition to equilibrate United States hegemony. With loosening unipol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Sino-Russia relations gradually devi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of balance of power to the complex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Therefore, bas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three schools-power, interest and identify observe twenty years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a better wa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Sino-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become a past, the variation of Sino-Russia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how to construct Sino-Russia relations forward to the future com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China,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regim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目錄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目錄	3
壹、前言	5
貳、三大學派的建制觀與分析折衷主義	6
一、三大學派的建制觀	7
(一)現實主義的建制觀—權力	7
(二)自由主義的建制觀—利益	9
(三)社會建構主義的建制觀—認知	10
二、科學哲學與分析折衷主義	11
三、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機制化平衡的結合	12
(一)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缺點	12
(二)機制化平衡的補充	14
(三)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機制化平衡的結合	18
肆、中俄關係二十年歷史背景與發展	20
一、早期中俄關係	20
二、中蘇關係發展背景與特徵(1949~1991)	21
(一)20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結盟	21
(二)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嚴重惡化	21
(三)20世紀70年代，中蘇關係持續僵持敵對	22
(四)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係緩和改善	23
三、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初發展背景與特徵(1991-2000)	24
(一)淡然友好時期(1992-1996)	24
(二)「戰略協作夥伴」建立時期(1996-2000)	25
四、中俄關係發展的轉變(2000~2008)	26
(一)戰略合作(2000-2001)階段	26
(二)摩擦(2001-2004)階段	27
(三)轉變熱絡(2004-2008)階段	28
五、金融危機下的中俄關係(2009-2012)	30
六、新普丁時期的中俄關係(2012~)	31
肆、中俄關係的轉變與深化—機制化平衡分析下的權力分布與互賴	32
一、中國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32
(一)中國決策者主觀認知上的國際權力分布	33

(二)經濟互賴程度	34
(三)中國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36
二、俄羅斯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37
(一)俄羅斯領導人的國際權力分布認知	37
(二)經濟互賴程度	38
(三)俄羅斯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40
三、中俄關係之機制化平衡分析	40
(一)美國因素	40
(二)中俄兩國經貿現況	42
(三)中俄能源政治與合作	45
伍、中俄關係的限制：國內因素	50
一、中俄軍事安全問題	50
二、中俄社會安全問題	54
(一)「黃禍論」(Yellow Peril, Жё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與俄羅斯遠東開發問題	54
(二)中國威脅？以聖彼得堡「波羅的海明珠」計劃爭議為例	56
(三)中俄經貿區域合作：從圖們江地區開發計畫看俄中間潛在矛盾	62
陸、上海合作組織對中俄關係的影響：機制化平衡工具抑是權力角逐場？	65
一、中俄關係之機制化平衡工具觀點	66
(一)社會認同的形成—反恐、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作為下的敵我認同	66
(二)專屬財產與社會認同促進同盟關係的穩固	68
二、中俄關係之權力角逐場觀點	68
柒、中俄關係的機遇與未來：兼論對台啟示	70
一、中俄關係未來發展爭議	70
(一)俄羅斯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70
(二)台灣議題	71
(三)美國政策	71
二、中俄關係發展對台灣的啟示	71
(一)經濟面	72
(二)國際安全面	72
捌、結論	73
參考文獻	76

壹、前言

普丁三度再次就任俄羅斯總統後於 2012 年 6 月 5 日首次拜訪中國。訪問期間，中俄兩國簽署了 17 份不同種類文件，並於在 6 月 6 日發表《中俄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進一步落實未來十年中俄關係發展規劃，東亞兩大強國間的微妙互動極受國際關注。

中國近二十年內在政經等方面強勢崛起，俄國也逐漸從蘇聯解體的挫敗中復甦，前者擁有相當大且成長快速的經濟及軍事體系，後者則有核武、豐富石油天然氣，及重要的軍事策略地位，而兩者皆是美國不想也不能放棄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國家，也是預估在不久的未來，決定東亞區域霸權舞台上主要的玩家。

從 1990 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中俄雙邊關係在摸索中前進，由於雙方在國際體系運作上，對一些國際議題上，尤其是區域安全議題，在美國的介入下，雙方的合作意願與看法日漸趨同，雙方合作可獲得的利益亦有增加的趨勢，因而形成中俄合作日益密切的互動結構。

但是在目前的東亞局勢因釣魚台爭議而緊張增溫之際，亟欲在亞太事務上彰顯其重要性的俄羅斯卻聞風不動，也罕見地沒有見到政府高層人士發表相關言論或支援「戰略協作夥伴」的中國，也不免令人思量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背後，是否有著極大的矛盾與不穩定。雖然，在中俄官方積極運作下，中俄關係邁向高度合作的趨勢與前所未有的友善關係，但在俄羅斯與西方學界部分學者對此發展發出高度的質疑與不以為然。這兩大接壤的世界強國，從過去的歷史展延的仇恨與敵意，尤其在邊界地區，真的能撇開歷史的心結嗎？而中俄雙邊的關係的實際性質為何？它們仍是敵手嗎？還是真的如同他們所宣稱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而是甚麼樣的因素來促使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是內部的因素驅動？還是外部因素驅動？中俄關係會往何處發展？雙方會組成正式反美聯盟或是合作破裂，雙方再成為敵手？而「中國崛起」是會為中俄雙方的策略伙伴關係造成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而這些問題都是中俄關係發展的變數，不得不深思之。

而由於當前的中俄關係議題涵蓋層面廣泛而複雜，在研究上易於掛一漏萬而陷於空泛。在檢視目前的中俄關係的理論中，多由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係三大學派中，也就是權力、利益和認知觀去做研究框架。但，中俄雙方在近年來頻繁的互動，雙方於多元層面合作下仍然存在的權力競逐，但卻又進一步深化雙方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關係的矛盾與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重返亞

洲是有著極大的關連性，因為在冷戰結束後，中俄共同面臨美國霸權的威脅，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係雙方對此情勢的反應(re-active)，以達到雙邊在共識與利益上的匯集。由於美國對外戰略牽動中俄關係的發展，中俄雙邊互動也影響著大國權力平衡關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本質除了有關平衡美國霸權外，既有的雙邊共識與追求利益張力似正影響著雙邊關係的發展。但近年隨著美國單極的鬆動與中國的崛起，中俄關係逐漸偏離傳統權力平衡的意涵，因此，作者在分析既有研究成果上，試圖引用賀凱(Kai He)的「機制化平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 概念，經由經濟互賴與權力層級的分析，來解釋中俄三方因美、中、俄三方國力的變化與權力、利益的持續競逐，台灣定位的曖昧使得台灣的經濟與政治經常受到中國的制約與干涉，中俄關係的發展變化，則會遷動全球戰略與權力平衡，更深影響亞太地區的安全，對兩岸關係與我台灣生存發展關係至為密切，此一議題的研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因此，此次之計畫案—「中俄關係 20 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係申請人延伸過去俄羅斯相關系列研究。檢視中俄(蘇)關係(1949-1991)的發展，鄰居(neighborhood)因素既是促進兩國發展的有力因素，也是惡化兩國關係的推動因素，也就是說當面對共同敵人時，在外部，也就是國際政治層面上或區域權力體系運作層面上，兩國的「戰略協作」性質就會彰顯(外熱 — 亦友)，但純屬內部，也就是經濟層面或社會層面上(國內因素)，兩國的鄰居因素就會浮現(內冷 — 亦敵)，尤其是對於日漸壯大的鄰居的戒備與防範心理，也就是國內安全問題—軍事安全與社會安全(這兩個問題都根植鄰界上)，使得中俄雙方的合作關係仍呈現不甚明確，有時僅有官方表面合作的狀態，因此，兩國的關係呈現懸而未決且不穩定的狀態。

爰此，本文試圖採取國際關係理論的折衷主義法，從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等國際關係三大學派中，汲取其合理的部分，作為分析問題與探討對策的研究途徑，特別針對中俄關係之歷史發展、政治、外交、經濟、能源、區域合作、社會和上海合作組織作探討，從權力、利益與認知面來探索中俄關係的未來發展。

貳、三大學派的建制觀與分析折衷主義

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係由學者陸傑所提出(John G. Ruggie)，陸傑認為國際建制係指「一組國家間相互期望、規則、條例與計畫，或者是組織起來的

力量與財務上的承諾，以上這些都是一群國家所共同接受。」¹克瑞斯勒(Stephen D. Krasner)提出了較為普遍接受的定義：「一組明示或默示之原則、規範、規則或決策程序；在此一基礎上，匯集某一特定國際關係領域中成員們的類似期望。」²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國際建制的觀點可分為三大學派—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及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而各學派對於國家間的合作分別採取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利益觀及社會建構主義的認知觀。

一、三大學派的建制觀

(一)現實主義的建制觀—權力

1.建制的動機

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與國內政治相同，兩者皆為爭奪權力的鬥爭，也是客觀人性(human nature)法則下的結果，而兩者不同之處僅在於權力鬥爭過程中所賴以進行的條件上差異。摩氏認為，利益是判斷與指導政治行為唯一永存的標準，且可用來定義權力。由於世界係由國家政治性地組織起來，國家利益便是政治的最後一個詞語，³國家利益可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永久存在的利益，例如，領土完整、主權等；其二，隨著環境變化的利益，任何國家利益驅使下的外交行為皆不離國家的政治、物質。⁴摩氏更進一步指出，國際利益不可能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雖然各國的政治人物常在公開場合提及某些國際的共同價值，然這些價值卻無法以現實政策加以補充，其主要原因仍在於國家利益的限制，例如，聯合國的各成員國不可能拋棄本身的國家利益，而去追求國際間的共同價值。因此，在國家利益的優先性與排他性下，國際組織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利益必定勝於國際目標。⁵

新現實主義大師華茲(Kenneth Waltz)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主因在於國際體系的因素，而國際體系又係以國家間權力的分配為主要癥結。不同的體系結構與國家的地位將產生迥異的國家對外行動，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普遍的不安

¹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1975), pp. 557-583.

² Krasner, Stephen D.,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³ Hans J.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Issue. 4(1952), p. 972.

⁴ Hans J.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p. 116-117.

⁵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p. 252-254.

全感將促使國家尋求生存，而追求權力求取自身「絕對獲利」(absolute interest)及關注他國的「相對獲利」(relative interest)成為主要工具，而國際合作僅係達成這些目的的手段之一。⁶而新現實主義學者史尼達(Duncan Snidal)亦認為，國際間的合作雖非不可能，惟合作仍須仰賴國家權力，在國家注重相對利益時，合作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⁷絕對利益與相對利益的調和，將決定國家是否採取國際合作，當國家重視短期的相對利益時，國家將不採取合作；反之，當重視長期的絕對利益時，國際合作則成為可能。包威爾(Robert Powell)指出，國家間的競爭雖使長期的絕對利益暫不實現，但這種動能終將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因此相對利益的假設可能會被一種絕對利益最大化的概念所取代。⁸

2.建制的效果

摩氏認為，國際政府或組織的存在或效能係取決於各國的認識—和平與秩序係有賴於共同約束(common bond)，而藉於此約束及共同權威道義下的作用，國際社會才得以向統合邁進。因此，共同權威及道義之建立，將成為國際政府成立的重要先決條件之一。摩氏更以 1815 年的「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及「聯合國」(United Nations)作為實證，在這些國際建制中，各國皆無法有效地解決紛爭與問題，在權力的相互競爭之下，共同權威或道義無法與各國的自身利益抗衡，因此國際建制的效力極其有限。⁹

新現實主義學者格里科(Joseph Grieco)認為，由於部分國家尋求相對利益，將導致所有國家放棄國際合作或國際建制，即使國際建制成立，亦是以一國的權力大小來決定其在建制中的行為，反映了各國現實的國際政治與國際權力結構，因此國際建制無法消除國際無政府狀態對於國際合作的制約力。¹⁰而華茲則認為無政府狀態為國際政治中的常數，且國際體系將影響國際單元的行為，故各單元間的關係將完全由能力來決定，進而形成一種純粹的政治與權力場域，在這個場域之下，國際間的合作將係偶然而非常態，而國際建制也將受到各國自身的權力

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88-101.

⁷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3.

⁸ Robert Powel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Anarchy," (Unpublished type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p. 456-457.

¹⁰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p. 27.

利益考量而無法發揮重要的效果。¹¹

(二)自由主義的建制觀—利益

1.建制的動機

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S. Nye)曾以互賴(interdpendence)來解釋1970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國際建制與非國行為者及其相互間關係，在互賴的情形下，相互需要與影響將使傳統的國家利益日益模糊。¹²新自由制度主義接受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間無政府狀態觀點，且認為國家行為可能扮演國際關係中的獨立變數角色，國家在理性功利至上的影響下，本諸國家利益與理性考量，當國家間重疊利益出現且合作有利於自身時，附條件式的國際合作便可能發生。然而該派學者對於無政府狀態的理解與詮釋卻迥異於新現實主義者，認為所謂的無政府狀態僅是對於國際間缺少一世界政府狀態的描述，而非意味著無政府狀態具有失序混亂(out of order)的特性，因此無政府狀態並非如新現實主義學者所說，將妨礙國際合作的達成。¹³新自由制度主義更認為，國際制度將有助於國際合作，且當兩個以上國家參與國際合作時，國家合作意願的考量將不受相對利益所侷限，而係以國家的絕對利益為主要考量。¹⁴

2.建制的效果

新自由制度學者認為，國際建制係國際政治中的獨立變數(independence variable)，由於國際社會間存在著廣泛的不確定性，缺乏國際建制則國際間協議將無法達成，國際建制便是藉由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間的合作。¹⁵國家間基於絕對利益而成立國際建制，則國際建制將有長久存在並發揮重要作用的可能，然而國際建制可促進合作，並非意味著可減少國際衝突，這與新現實主義所期待的國際建制效果有別。¹⁶隨著國際社會互賴程度的提高，國際建制將持續發

¹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4-115.

¹²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Summer, 1971), pp. 338-339.

¹³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January, 1991), pp. 67-85.

¹⁴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1-171.

¹⁵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180.

¹⁶ Robert O. Keohane &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 pp. 50-52.

展，且其發展不依賴霸權國的意願¹⁷

(三)社會建構主義的建制觀—認知

1.建制的動機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將國際建制視為理性工具之產物，且產生與發會作用係取決於早於建制存在的國家意願。¹⁸這種被視為理性主義方法的觀點備受社會建構主義學者質疑，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國際體系之結構係由社會關係層面，透過回溯先前之主客體互動由主體認知而定之情形，體系結構係由主體認知所形塑，進而影響主體之行為。是以一項認知及概念在國際社會中被賦予社會意義，產生規範性質後在國際社會中擴散與內化，此時及具賦予物質意義之社會化效果，具有達到建制化之可能。¹⁹

國際的社會行為者係以認同來區分“我”與“他”，認同主要可分為四種類型：實體認同(personal or corporate identity)、類型認同(type identity)、角色認同(role identity)及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實體認同是一種類的屬性認同；而類型認同係某種共享特徵；角色認同完全係由社會互動與觀念判斷的結果；集體認同則是淡化“我”與“他”的區分，形成一種“自家人”的關係。角色認同與集體認同係由社會互動所獲得，而實體認同與類型認同則否。²⁰由於該學派強調知識及認同在國際建制建立時與運作中的作用，因此也被稱為知識基礎的國際建制理論。²¹雖然該學派為國際建制研究注入新觀點，然而其尚未形成一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

2.建制的效果

溫特進一步指出，國際間的權力政治與無政府狀態係由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國家所建構，因此國家也可建構出不同的無政府國際體系文化：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及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這三種文化分別代表國家相互間不同的互動與實踐，進而造就出不同的規範與制

¹⁷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Issue. 4(Autumn, 1987), p. 733.

¹⁸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1984), p. 243.

¹⁹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Winter, 1994), p. 72.

²⁰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9), pp. 224-230.

²¹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 Volker Rittberger,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Vol. 26, No. 1(January, 2000), p. 1.

度；在霍布斯體系文化中，國家間充滿敵意，行為準則是國家間互不承認其為主體所具有的權力，且無限制地使用暴力；洛克體系文化中的國家具有競爭關係，雙方相互承認在主權制度之下的生存與財產權利；康德體系文化的國家間互相友好，並奉行互助與非暴力規則，雖然仍存在著利益的衝突，但不以暴力方式解決之，而這三種文化具有演進的關係。國際建制在這三種無政府體系文化之下，僅存在於洛克與康德體系文化，並在康德體系文化中可望發揮最大的效果。²²

二、科學哲學與分析折衷主義

哲學科學(philosophy of science)是 20 世紀興起的一種哲學分支，主要用以研究科學的本性及科學理論的演進與合理性，其中重要的學者如：庫恩(Thomas Kuhn)的範式(paradigm)、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研究綱領及勞丹(Larry Laudan)的研究傳統。範式係指一個理論集中國用的信念，包括共同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本體論、認識論等。庫恩認為，範式間的轉換，屬於一種宗教信仰的轉變，而範式間之間具有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且在科學革命的過程中，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因此難以斷定一個理論的優劣，新舊範式亦無從比較，無法有效地觀察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情形。²³

卡列拉斯提出研究綱領，其目的係為建立科學理論多元視角的發展空間，研究綱領係指一種理論的系列(a series of theories)，而非係單一理論或假定，並使用精緻的否證主義(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來斷定一個理論的優劣與進步。研究綱領包括：硬核(hard core)、保護帶(protective belt)、正面啟發(positive heuristic)及負面啟發(negative heuristic)四大要素。硬核是研究綱領的基本假設(assumption)；保護帶係指一連串的假設(hypothesis)，用以保護硬核；而正反面啟發可指引研究者正確的研究方向。卡式進一步提出兩個標準來判斷研究綱領的優劣，即理論進步與經驗進步，前者須檢視研究綱領的內涵的修正，是否有助於新事實的預測；而如果這些新事實的預測有某部份為成功，即為經驗進步。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研究綱領可體現在結構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²⁴

勞丹提出的研究傳統係指一組特定的本體論與方法論假定規則，研究傳統係構成理論的重要因素，具有維護理論合理性的作用。研究傳統並非用來斷定理論優劣的工具，勞丹認為，一個依據某項研究傳統所做出的判斷，儘管涉及到不同的理論假設，仍可與其他理論的觀點契合。²⁵這項觀點與卡贊斯坦 (Peter

²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46-308.

²³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²⁴ Imre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Programmes*

²⁵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Katzenstein)及希爾(Rudra Sil)提出的分析折衷主義不謀而合，兩者同樣係強調跨範式的研究的可能性。分析折衷主義的主要目的係透過不同範式的補充與整合，以加強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使研究者具備觀察國際事務的多重視角。該主義係從相互獨立的研究傳統中，重新組合出一種結合相關概念及方法的獨創性排列。²⁶

三、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機制化平衡的結合

由於現今中俄雙方的合作層次已不同於以往的國家間合作，若欲以三大學派的任何單一理論解釋該現象，難免有掛一而漏萬之弊。因此需要一種框架用以解釋在近年來頻繁的中俄互動中，雙方於多元層面合作下仍然存在的權力競逐，以及雙方在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後，迅速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因此本文擬採取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從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等國際關係三大學派中的權力、利益、認知觀，汲取其合理的部分，去探討中俄近年來的雙邊關係。

近年來國際關係學派雖多元發展，卻無法改善國際現狀解釋不力的現實，促使學者們開始反思這些理論的效用問題，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基歐漢曾指出，在911事件發生之後，非正式的暴力行為，使學派之間的爭論顯得狹隘，因此有透過各學派間對國際政治基本要素的整合，才可望改善現今理論的解釋力。²⁷然而各種不同的理論具有迥異的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這些研究傳統在本體論(ont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y)上有各自的假定規則，因此也發展出了各種不同的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s)。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及希爾(Rudra Sil)曾提出分析折衷主義，在實證研究中應用使用務實方法，將不同的研究傳統組成要素加以整合。

(一)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缺點

J. J. Suh(約翰霍普丁斯大學教授)曾提出一個國際間合作的模型，根據該模型指出，權力分布(power distribution)為國際間合作或同盟的主要動機，而當雙方進入同盟之後，將產生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及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如圖1之T1，而資產專屬性與社會認同產生後將使原先的同盟更趨穩固(Alliance

²⁶ Peter Katzenstein & Rudra Sil, "What is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 presented for 7th 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2005), p. 8.

²⁷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

Persistence)如圖 1 之T2。Suh的模型原本係用以解釋美國與南韓在軍事同盟上的關係，日趨穩固的背後因素。該模型的重要因素定義與特性如下：²⁸

1.同盟的動機—權力分佈(power distribution)：權力分佈具有可認知性，且可由國家自身獨立所得出，基於此種認知，國家可察覺外部危險(external danger)之存在。Suh認為，當某些國家不樂見權力分佈時，防禦同盟(defensive alliance)即成為制衡該分佈的主要工具。²⁹

2.同盟：Suh係採用Kegley與Raymond的定義：「兩個主權國家間存在正式的協定，而該協定係以明確的軍事合作可能性為其推定之目的。」如此的定義可區分某些類似的現象，例如：結盟(alignment)等較為非正式且內涵較為廣泛的概念。³⁰

2.專屬資產：Suh借用學者Oliver Williamson的觀點，認為雙方同盟下的雙邊投資行為將使終結同盟耗費高度的機會成本，而專屬資產可分為四大類：設備(equipment)、過程(process)、人力資產(human asset)及區域專屬(location specificity)，其中模型中的專屬資產係專指設備方面。³¹

3.社會認同：所謂的社會認同，係在同盟的實踐中，同時產生出「我們」與「他們」的區分。雖然社會認同無法作為一個同盟的動機，卻可成為同盟穩固的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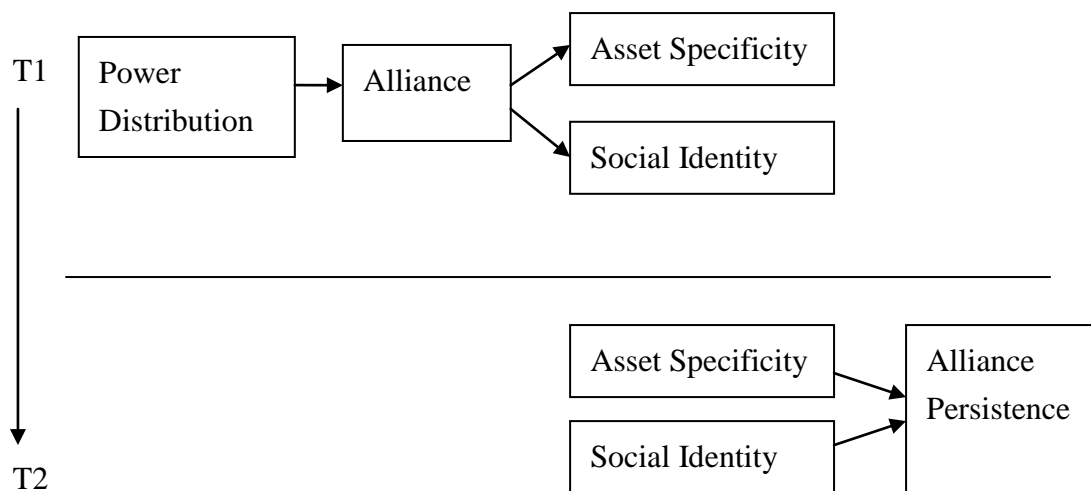


圖 1 學者 J. J. Suh 的模型

²⁸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CA: Stanford Press, 2004), pp. 165-169.

²⁹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op. cit.*, p. 134.

³⁰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op. cit.*, p. 133.

³¹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op. cit.*, p. 141.

力。³²

該模型將三大學派的權力觀的權力分佈(Power Distribution)、利益觀的專屬資產(Asset Specificity)及認知觀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三大因素加以整合,使之成為一套解釋兩國同盟動機與愈趨穩固的情勢的模型。然而此模型亦存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其一,Suh 並未敘明,在何種情勢之下的權力分佈將成為雙方同盟的動機;其二,Suh 認為,同盟將產生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進而鞏固同盟關係,惟同盟為一廣義概念,在如此廣義的內涵下,可能包括多種的同盟關係:軍事同盟、經濟同盟等。而同盟經過時間的推移與國際情勢的演變,在內涵上亦有所轉變,如現今全球化下的國家同盟具有濃厚的經濟互賴為基礎,與 19 世紀的同盟不可同日而語,若以 19 世紀的軍事同盟為例,國家間的同盟僅係權力平衡下的短暫手段之一,雙方在短暫的同盟狀態下,亦難以出現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是以,同盟的概念尚須進一步區分。本文擬以制度現實主義(Institutional Realism)學者賀凱(He Kai)的機制化平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來補充解釋在經濟互賴與權力分佈的排列組合下,何種情形始得產生同盟或機制的動機。

(二) 機制化平衡的補充

1. 機制化平衡提出之淵源

冷戰結束後,美蘇的兩極體系(bipolar)正式瓦解,而區域主義(regionalism)則逐漸在世界各地興起,該主義源自於 1950 年代的西歐,當時正倡議建立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曾有將之稱為,「舊區域主義」(old regionalism)。而新一波的區域統合則始於 1980 年代,於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失敗後,雙邊及區域貿易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³³區域主義身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強調國家間合作之可能性,而於後冷戰時期擴張至東亞地區,使該區的統合制度開始萌芽。中國崛起後,該區的統合程度雖有廣化現象,然而在深化上卻停滯不前。

為解釋此現象,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雖承認國際合作之可能性,但仍認為國際合作須仰賴國家權力,特別在於國家所關注的利益類別,倘若國家所關注的為相對利益(relative interest),則合作可能性極低;³⁴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則

³²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op. cit.*, p. 152.

³³ Wilfred J. Ethi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yst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

³⁴ Snidal, Duncan,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11.

認為，國際合作可促進參與者的絕對利益(absolute interest)而非相對利益。³⁵然而兩大學派皆無法明確地解釋當前東亞區域統合的狀況，新現實主義無法解釋該區國家的合作情形；而新自由主義則無法說明為何該區的統合會裹足不前，為此，制度現實主義學者賀凱提出了機制化平衡概念，用以解釋東亞區域統合之現狀。³⁶

2. 機制化平衡的內涵

機制化平衡係立基於新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接受無政府狀態及國家追求安全的兩大假設，並整合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互賴(independence)及國際制度。由於單一理論有其侷限性，不少學者提出工具箱(tool box)的途徑，藉以分析某些理論，進而建立新的研究架構。學者西蒙(Simon Sheldon)的「雙軌理論」(dual-track)即結合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以「雙軌」的方式來解釋東南亞的區域安全。³⁷托氏(William Tow)的「安全匯聚理論」(convergent security)一舉整合現實主義/多邊主義以及制度主義/多邊主義，藉以解釋亞太區域的秩序。³⁸而賀凱即以此種工具箱途徑的概念出發，整合權力平衡、互賴及國際制度，提出機制化平衡理論。

機制化平衡中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與「國際建制」概念應先予以區別，新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認為，國際制度是規範行為角色、限制活動及形成期望的一系列持續並相關連的正式與非正式規則。³⁹而其又進一步指出，國際制度尚可包含國際建制、政府間組織及跨國性組織，顯然國際制度為國際建制之上階概念。⁴⁰抱持相同見解的學者有哈格德(Stephen Haggard)與西蒙斯(Beth A. Simmons)，他們認為國際制度是比較不具明顯的權利義務或規則，與制度化的國際常規(國際建制)有別。⁴¹然亦有學者認為，兩者並

³⁵ Grieco, Joseph M., "Anarchy and the Limited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2.

³⁶ 學者賀凱在其博士論文「制度化安全、制度現實主義及東南亞的多邊制度」(2007年5月)中，首次提出「制度現實主義」(institutional realism)及「機制化平衡」概念。

³⁷ Simon, Sheldon,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2, (1995), pp. 5-24.

³⁸ Tow, William,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

³⁹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3.

⁴⁰ Keohane, Robert 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s a European-American Research Programme,"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28.

⁴¹ Haggard, Stephen, & Simmons, Beth A.,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495-496.

無區別。⁴²筆者認為，以「機制化平衡」的功能而言，取代柔性平衡實為賀凱提出該理論的主要目的，因此為完整涵蓋柔性平衡的適用領域，宜以前者之見解為宜，以擴大機制化平衡在國際關係研究上的使用範疇。

機制化平衡係指透過發起、利用及主導多邊制度，來針對壓力與威脅作出反擊，而該理論並可歸結出兩個觀點：其一，基於高度的經濟互賴，國家開始選擇以機制化平衡的方式來面對體系內的威脅與壓力，而非傳統的軍事同盟；其二，國家按照其主觀認知的權力分佈來決定採取何種機制化平衡策略(排他性抑或包含性)。⁴³

3. 機制化平衡的假設與模型

國家選擇採取權力平衡或機制化平衡，取決於兩大因素—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佈與國家間的相互依存。當決策者認為國家間的相互依存感強烈而追求權力平衡的成本過高時，將會採取機制化平衡策略，反之則否。而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佈則決定了國家取機制化平衡的方式，具有「排他性」(inclusively)與「包含性」(exclusively)兩項子分類，經整理後列表如下：

		經濟相互依存	
		弱	強
權力分佈	單極	權力平衡 (霸權與殖民戰爭)	機制化平衡 排他性 (霸權與其他國家)
	兩極	權力平衡 (兩大陣營之間)	機制化平衡 (兩個超級大國領導)
	多極	權力平衡 (戰爭的高度可能性)	機制化平衡 包含性 (把目標國制約在制度內)

表 1 極性、互賴及國家行為

⁴² Hasenclever, Andreas, Mayer, Peter, & Rittberger, Volk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

⁴³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and In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 492.

資料來源：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0.

在包含性機制化平衡策略中，國家將目標國制約於制度內，除了透過制定規範來限制其他國家的行為，更操縱議程的設定來滿足自身國家的利益；然而在排他性機制化平衡策略中，國家將持續加強制度內的政治經濟整合，藉以對抗制度外的目標國。

4. 機制化平衡中的獨立變數

(1).經濟互賴的程度

互賴(interdependence)係由經濟學者庫柏(Richard N. Cooper)所提出，他從1960年代國際間流動頻繁的人力、商品、資金及通訊之現象中，發現此一國際新潮流，在其著作「經濟的互賴：大西洋共同體的經濟政策」(*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問世後，互賴即成為學者熱衷的研究主題之一。⁴⁴而後美國國際政治學者莫斯(Edward L. Morse)首先將互賴概念適用到美蘇冷戰時期政治戰略上的相互影響及作用，他認為在發達國家間的經濟互賴關係將影響其戰略目標之訂定，使得國家的外交、軍事及政治自零合遊戲(zero-sum game)轉變為雙贏(two wins)性質。⁴⁵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基歐漢與奈伊認為，互賴係指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的行為者之間，存有互惠效果的情形。惟互賴將限制主權的行使，且不必然皆能收獲利之效，因此互惠效果亦常伴隨著成本獲利。⁴⁶

於按照賀凱的見解，經濟互賴約略可以國家間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簡稱FDI)、貿易額占GDP的百分比及兩國間的雙邊貿易額作為評估的指標，例如賀氏即曾在探討中國的機制化平衡時，提出上述三個指標來評估中國經濟互賴的程度。⁴⁷

(2).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權力分佈

在機制化平衡模式的另一個獨立變項—國家權力分佈中，賀氏利用國際體系

⁴⁴ 請參閱 Cooper, Richard N., *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⁴⁵ 請參閱 Morse, Edward L.,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⁴⁶ 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pp. 8-9.

⁴⁷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p. 23-30.

中極性(polar)的概念，將國際體系依權力分佈分為三種情形：單極、兩極及多極體系。卡普蘭(Morton A. Kaplan)認為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係指國際間若干相互關聯的變數，而於外在環境不變的情形下，具有影響及左右成員行為之功能；⁴⁸而霍斯第(K.J. Holsti)認為國際體系係指由獨立的政治單位所組成的集合體，這些獨立的政治單位則係依據規範化的過程進行經常性的互動。⁴⁹根據新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觀點，國際體系變遷之動力，主要係因各國認為國際體系現狀之改變在長期上將利多於弊，抑或目前狀態長期發展之下，將弊大於利。⁵⁰二次大戰後的國際體系，係從冷戰時期的緊密的二極體系，由美國所帶領的自由民主陣營對抗由蘇聯帶領的共產國家陣營，到冷戰後期，美蘇之間的關係趨於和緩，國際體系從緊密的兩元體系，演變為鬆弛的二極體系，到19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國際體系又產生轉變，國際體系已形成由美國領導的單極為主的多元體系。

賀氏認為，機制化平衡中的權力分佈變項，主要係用以了解國家行為，因此其所列之三種國際體系，乃係取決於決策者對於當前國際體系之認知，而非單純就權力分佈予以定量，決策者之認知則須從國家領袖的公開談話與相關官方文件來推知。⁵¹

(三)、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機制化平衡的結合

綜上所述，賀氏的機制化平衡認為，唯有在經濟互賴程度高的情形下，國家始有採取機制化平衡的可能，否則將回歸昔日的軍事同盟與對抗。而國家在不同的權力分配認知下(以國家主觀上的感受為主)，始生不同的手段(包含型及排斥型)。根據 Suh 的分析折衷主義模型，僅指出國家在同盟的狀態下即可產生專屬財產與社會認同，而該模型對於同盟的定義為：「兩個主權國家間存在正式的協定，而該協定係以明確的軍事合作可能性為其推定之目的。」如此廣泛的同盟定義若以19世紀的軍事同盟來解釋，將無法得出同盟產生社會認同及專屬資產的現象，而使該模型受到實證上的嚴峻挑戰。因此具有進一步限縮或修正其同盟概念的必要。

⁴⁸ Kaplan, Morton A.,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7), p. 20.

⁴⁹ Holsti, K.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3), p. 96.

⁵⁰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2.

⁵¹ Wohlforth, William,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Summer, 2005), pp. 91-129.

經過賀氏機制化平衡的提出，可了解現今的權力分配固為兩國同盟之重要因素，高度經濟互賴亦促使行為國採取機制化措施制衡目標國，而在眾多的行為國採取相同的機制化平衡策略後，始具有產生共同制度(common institution)的可能。倘若經濟的互賴程度較低，行為國將採取傳統的權力平衡手段制衡目標國，如此一來將回歸到 19 世紀的權力平衡情形，無法產生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唯有在高度經濟互賴下的機制化平衡(包括包含型與排他型)始有產生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之可能。

在機制化平衡模型之下，當兩個國家與制衡目標國之間皆具有高度經濟互賴，且目標國(common country)及機制化平衡手段(包含型或排他型)同一，則兩國之間使產生建立共同制度的可能，在共同制度的作用下，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始得形成，進而使兩國之同盟更為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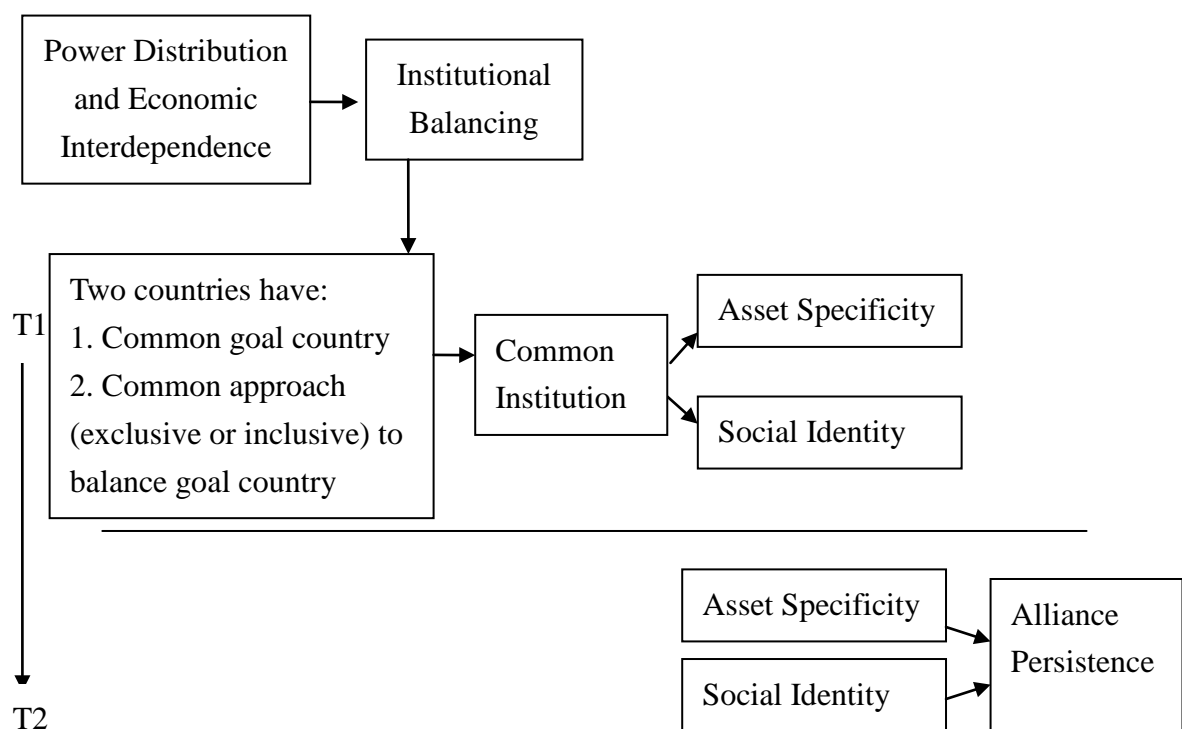


圖 2 機制化平衡與分析折衷主義結合後之新模型

參、中俄關係二十年歷史背景與發展

從 1989 年戈巴契夫訪中後，中蘇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雙方高層開始展開互訪。俄羅斯在冷戰結束初期民生凋敝、經濟情勢嚴峻，因此實行「親西方」外交政策，希望藉以得到西方各國的經濟援助，惟「親西方」的外交政策成效不如預期，西方各國的經濟援助時常口惠而實不至。俄羅斯面對美國的一超獨霸與北約東擴壓力，於 1993 年提出「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開始調整其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強調俄在獨立國協地區的特殊利益與發展穩定的俄中關係，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逐漸朝向東西方並重的「雙頭鷹外交政策」，拉攏東方以制衡西方成為俄羅斯主要的外交策略，中俄雙方的外交關係開始熱絡，高層會晤頻率增加。自 1996 年中俄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開始，建立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每年舉行一次，下設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人文合作委員會和能源談判代表會晤三大機制，是中國對外合作中規格最高、組織結構最全、涉及領域最廣的磋商機制。2010 年雙方元首即已進行 2 次互訪六次會面，創下歷年來雙方元首會面的高峰。幾次會面中，對於愈趨密切的「中」俄關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都強調，兩國高層頻繁互訪足以顯示兩國相互依存度日趨升高，關係密切，有利於促進兩國深入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現今密切的中俄關係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若欲探討中俄關係的現狀與未來發展，必須先了解中俄歷史上的往來與互動，以收鑑往知來之效。

一、早期中俄關係

俄羅斯於西元 862 年才逐漸形成一個國家的雛形，此時中國已經過了盛唐貞觀之治時期並進入中晚唐。13 世紀時，中俄兩國同受蒙古人統治，在中國稱之為元朝，在俄國則稱為欽察汗國，直到明清之際，雙方關係的歷史記載皆僅著重於商務方面。至清代初期，中俄簽訂了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中國時值康熙盛世；而當時俄國的彼得大帝雖已登基，卻尚未親政，因此亦未展開俄國的西化大改革。當時俄國的陸軍、海軍皆尚未成軍，更遑論海軍，由於俄方仍欠缺足夠的軍事實力，因此對於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中俄雙方的歷史記載皆認為，此係屬平等性質的條約，與清朝末年道光以後的那些不平等條約有別。1729 年(清雍正 7 年)，俄方曾派過一位「托時」大使至中國。1771 年(清乾隆 36 年)，36 名俄國人亦曾登台，惟受到 4000 名島上原住民驅逐。1860 年左右，中俄之間簽定了若干條約，其中包括：咸豐 8 年的天津條約及璦琿條約、咸豐 10 年的北京條約。然而這些條約卻已屬於不平等條約，俄國人在這些條約的簽訂下，蠶食鯨吞了很多中國領土。到了 20 世紀，俄國的國力已經發展至巔峰，並成為美蘇兩大爭霸

的強權，回顧三百年以來的俄國，國力增長異常迅速，實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

二、中蘇關係發展背景與特徵（1949~1991）

中蘇關係(1949-1991)發展的背景與特點，可分為三點：一是美蘇中的三邊關係，另一稱為「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二是中蘇共黨意識形態的爭論；三是中蘇邊境衝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 1991 年蘇聯解體，中蘇關係大約呈現四個階段的變化，也就是友好—惡化—敵對—緩和的變遷過程。

(一) 20 世紀 50 年代，中蘇友好結盟

1950 年代，國際上美蘇冷戰，中國國內國共兩黨爆發內戰。蘇聯在東北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蔣介石政府對美國的依賴，和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帶有濃厚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趨勢，造成當時國民黨政府和蘇聯政府的敵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行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1950 年 2 月 14 日，雙方簽署了為期 30 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中蘇結成全面同盟，蘇聯是「老大哥」(senior partner)，中國則是「小老弟」(junior partner)。

(二) 20 世紀 60 年代，中蘇關係嚴重惡化

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上台後，尤其是從 1950 年代末期以來，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兩國關係逐漸變冷。中蘇共之間的矛盾開始浮現，雙方的衝突包括北京發展核子武器計畫、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鞭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大躍進、中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競逐，再加上赫魯雪夫在 1959 年和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在大衛營的會談等，由於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國家利益的分歧，使中蘇關係很快惡化，而在 1960 年代開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內部鬥爭提高了意識形態地位，1968 年，蘇聯率同華沙公約組織國家軍隊強力鎮壓「布拉格之春」，布里茲涅夫倡議社會主義國家的「有限主權論」，更加強了北京對莫斯科的疑懼，意識形態的爭論嚴重地影響了兩國關係的發展，⁵²而最終成為中蘇兩國的尖銳對抗，更由於中國拒絕了蘇聯提出關於組建中蘇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提議而引發兩

⁵²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吳玉山，*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1997，頁 187-192

國之間的不快。

此外，邊境衝突也是中蘇關係惡化的主因之一，1960年，中蘇在新疆爆發第一次邊界衝突，1964年，中蘇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在這次談判中，雙方交換標有各自主張的邊界線地圖，雖然，具體討論了東段邊界問題，但對位於黑龍江、烏蘇里江匯合處的黑瞎子島歸屬爭議不休，談判無果而終。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在邊境地區大量增兵，並派軍隊進駐蒙古，1969年，先後發生了珍寶島⁵³和鐵列克提⁵⁴事件，雙方從意識形態冷戰演變為邊境衝突熱戰，中蘇關係全面嚴重惡化。

(三) 20世紀70年代，中蘇關係持續僵持敵對

由於在現實主義策士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斡旋下，美國為了結束越戰，開始和中國頻頻接觸，季辛吉和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先後於1971和1972年訪問中國，美國宣布承認一個中國，中美關係開始改善。而尼克森更於訪問北京之後，馬上赴莫斯科和布里茲涅夫會面，為美蘇的和解(détente)鋪路。但，莫斯科和北京仍舊呈現緊張的局勢。

1973年，毛澤東提出「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一條橫線，聯合起來對付「北極熊」，也就是蘇聯。1974年，毛澤東進而提出「三個世界」理論，具體指團結亞、非、拉第三世界，爭取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美蘇兩霸，著重打擊蘇聯霸權主義。

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到1980年滿30年。中國於1979年4月以全國人大通過決議，決定期滿後不延長，並建議就解決兩國之間懸而未

⁵³ 珍寶島，俄羅斯稱之為達曼斯基島(Damansky Island, остров Даманский)。位於中國黑龍江省虎林市，中俄界河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全島面積0.74平方公里，長約1700米，寬約500米。距西岸200米，距東岸300米。該島在枯水期和中方陸地相連。珍寶島事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曾因珍寶島歸屬問題於1969年在島上發生武裝衝突。最終，中國軍隊獲得勝利，得以駐紮在此爭議地區。2005年4月27日，中國全國人大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2005年5月20日，俄羅斯國家杜馬表決批准該協議。根據該協議，珍寶島是中國的領土。А.Елизаветин,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я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5, с.44-62,

⁵⁴ 鐵列克提是中國新疆塔城地區裕民縣的一個地區。裕民縣地處塔城盆地西南邊緣，西與哈薩克共和國交界，東北與塔城市、額敏縣相鄰。鐵列克提事件是指，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中國和蘇聯的關係急劇惡化，雙方迅速在邊境集結了上百萬的軍隊。在鐵列克提，中蘇之間有一個幾十公里寬的爭議地帶。1969年，中蘇雙方都在爭議地帶上修建了軍事設施。1969年8月13日，中蘇在西部邊界鐵列克提地區再次發生武裝衝突。蘇軍出動直升機掩護坦克裝甲部隊，在炮火支援下襲擊在鐵列克提地區巡邏的兩個中國邊防軍巡邏分隊，其中一支巡邏分隊28人（包括3名隨軍記者）被圍全部陣亡。鐵列克提地區的主權問題在1994年至1999年間幾次的「中哈國界協定」協商中得到解決，當年衝突地帶已明確劃歸中國。

決的問題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1979年9月至11月，在莫斯科舉行了中蘇國家關係的談判，也涉及邊界談判，但卻因雙方立場尖銳對立，再加上1979年底，蘇聯出兵阿富汗，雙方中斷談判，導致關係持續敵對，並無進展。中蘇敵對的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

(四) 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係緩和改善

1980年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蘇聯領導人的更迭及國內要求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中蘇關係出現轉機。

1982年3月24日，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在中亞塔什干對中國發出了友好的訊息，明確承認中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強調支持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中關係。

1982年10月，中蘇雙方在北京開始進行兩國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期間長達六年，磋商中，主要討論鄧小平所指之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從中國北部的中蘇邊境和蒙古撤軍，從中國的西鄰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磋商中，中蘇雙方並無共識，各說各話，被稱為「聾子對話」。不過，這漫長的政治磋商為彼此交換意見提供了一個正式渠道，對兩國關係的緩和與改善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中蘇之間開始改變一個時期以來只對抗、不對話、不往來的全面僵持狀況。隨著中蘇政治磋商的持續進行，從恢復交換留學生開始，兩國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往逐漸增多。1984年底，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I. V. Arkhipov, И. В. Архипов)訪中後，雙方恢復了中斷多年的經濟、科技合作。

1985年3月，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對外推動「新思維」的和平攻勢。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1986年7月28日戈巴契夫在海參崴宣布，蘇將分階段從阿富汗撤軍；正同蒙古討論撤出大部分蘇軍問題；願同中國討論削減中蘇邊境地區的陸軍；同意按主航道劃分阿穆爾河(黑龍江)邊界線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國的國內政策，這些發言視為是對中國作出重大讓步。

1987年2月，中蘇雙方在莫斯科重啟了第三次的邊界談判。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巴契夫應邀至中國進行訪問，並與鄧小平舉行高級會晤，重新建立中蘇關係。1991年5月16日雙方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這協定確認了蘇聯對外東北的統治，並確認黑龍江是中俄的國界。

但，1991年蘇聯解體，中蘇關係變成了中俄關係。俄羅斯雖然是蘇聯最主要的繼承者，隨著蘇聯後期的經濟危機與俄羅斯獨立初期的經濟困頓，莫斯科已不再是國際超級強權角色，國際局勢的轉變也同樣為雙方關係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三、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初發展背景與特徵(1991-2000)

中俄關係(1991-2000)發展的背景與特點，一是民主轉型的俄羅斯重西輕東；二是中俄關係「戰略」性質的建立。承接了中蘇關係歷史包袱的中俄關係，存在的已經不是對於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分歧，而是國家制度選擇上的分道揚鑣。因此，中俄關係可以跨越意識形態對之前中蘇關係發展的束縛，而是從國家間利益來發展中俄關係。

而此時期的中俄關係發展是依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走向而定，兩者關係從淡然友好(1992-1996)逐步走向「戰略協作夥伴」建立(1996-2000)。

(一) 淡然友好時期(1992-1996)

蘇聯解體後，中國馬上對俄羅斯釋出善意，第一時間承認俄羅斯獨立，並且在聯合國支持俄羅斯繼承蘇聯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隨後中國總理李鵬又邀請葉爾欽訪問中國。

1992年俄羅斯總統葉爾欽首次訪華，並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聲明中指出「將兩國關係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並使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互視為友好國家」。⁵⁵1994年，發表中俄聯合聲明，「要發展長期、穩定、睦鄰友好、相互合作、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伙伴關係」(“to develop long-term, stable, good-neighbor, mutually cooperative,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facing the 21st century”)。同(1994)年，兩國簽署「中俄國界西段協定」，至此，確認了98%的中俄邊界線走向。

但，此時期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獨立初期，葉爾欽在經濟上採取西方所建議之「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外交上也因國內政治思潮「大西洋主義」

⁵⁵ 新華網，「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1992年12月28日)」，詳見新華網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27/content_642356.htm

(Atlanticism)⁵⁶的影響，希望全面改善與發展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期待獲得西方大量經濟援助，並與西方結成戰略聯盟，以期實現融入西方世界的戰略目標，而以西方為其外交的主要方向。俄羅斯對外政策上的「重西輕東」，即使中國積極和俄羅斯接觸，建立友好關係，但，中國在俄羅斯外交中定位既不明確，更不可能處於優先地位，因此，中俄關係在此時期雖有官方的接觸，卻沒有進一步的實質發展。

(二)「戰略協作夥伴」建立時期(1996-2000)

由於實施震盪療法經濟上大幅衰退，而使得俄羅斯逐步放棄一面倒向西方的戰略，以普利馬可夫(Evgeniy Maksimovich Primakov, Евгé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外長為代表推行東西方並重的所謂「全方位」外交政策，開始注意對外政策中的東西方平衡，希望與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完全平等的伙伴關係，捍衛俄羅斯自身利益，改變對西方國家一味讓步的局勢，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成為世界多極體系中的一極。亦即更加重視對亞太國家的外交，以及外交政策在各個主要區域的平衡。亞洲對俄羅斯外交愈形重要，而中國即為合作的重點對象。⁵⁷

1996年4月23日葉爾欽在訪問中國的路上，將先前之「建設性伙伴關係」修正為「發展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to develop an equal and trustworthy **strategic partnership** oriented toward the 21st century”)⁵⁸，而這也是第一次，俄羅斯和中國公開宣示雙邊將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兩國展開全面合作，對具有高度戰略性的區域及國際議題加強彼此溝通，合作範圍及內容皆大幅擴展。兩國建立元首定期會晤機制，為兩國全面交往及各領域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另兩國總理層級定期會晤機制亦自1996年12月正式啟動，專責研商兩國經濟合作問題。⁵⁹

雖然，此時期俄羅斯開始重視亞太區域，但，葉爾欽時期，由於實施震盪療法經濟上逐步衰退，相對於中國的日漸發展，俄羅斯不像蘇聯在冷戰時期一般的

⁵⁶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主張融入西方，效法西方的民主主義，這一派學者主張在蘇聯剛解體時曾一度蔚為主流，但由於與當時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及在現實上受到美國所給與的國際政治中「二等公民」的待遇，更使得早期採取親西方主義改革派的葉爾欽無法找出俄羅斯專屬的國家定位。

⁵⁷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九卷第三期，2008年7月，頁106-108

⁵⁸ Li Jingjie, “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in Sherman W. Garnett, ed., *Rapprochement of Rivalry?-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p. 88.

⁵⁹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頁109。

對外擴張，而是以維持本國遠東區和西伯利亞區的國家安全穩定為要務，因此，對於中國的崛起與東亞的權力體系十分注意⁶⁰，因此，中俄關係的「戰略」性質就是根植在國際與區域的權力體系上，可以看出，「第三國」是雙方關係的合作基礎。

四、中俄關係發展的轉變（2000~2008）

普丁時期，在近十年間，中俄關係可說是有大幅度的增長，其中包括軍售、軍事研究、貿易以及領土協議等方面的合作，除此之外也陸續簽訂了許多合作條約。但，普丁時期的中俄關係並不是一直如此順遂，2001至2004年，普丁仍與西方維持良好互動，並開始和中國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所摩擦，但2004年歐盟第二次東擴，及自2006年起俄羅斯對西方(美與歐盟)外交政策的突然急轉直下⁶¹，俄羅斯開始著手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合作，特別是與中國熱絡一度有所鬆弛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引起了國際間高度的關注。因此，此時期的中俄關係經歷了戰略合作(2000-2001)—摩擦(2001-2004)—轉變熱絡(2004-2008)三個階段。

（一） 戰略合作(2000-2001)階段

1999年發生科索沃戰爭，柯林頓公開宣布「科索沃模式」可以成為人道主義干涉的普遍模式⁶²，而由於中國與俄羅斯分別存在台灣與車臣的問題，雙方因而加強戰略協作，並在該問題上相互支持各自維護國家統一的努力，2001年6月15日，中俄合作倡導推動成立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or SCO,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進一步加強中俄在地緣政治的控制力，抵制美國的勢力介入。

2001年7月16日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CT),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該條約是中俄北京條約之後的第一

⁶⁰ Иванов И., «Россия в Азии и Азия в Росси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N1, 2004г, с.3

⁶¹ 吳玉山(2009)認為2006年起俄羅斯對西方的外交政策突然急轉直下的因素並不是如西方論點般純然是外在環境，也就是國際因素所導致，不可否認，國際因素(俄羅斯國力的復甦，歐盟與NATO的東擴)也是因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國內政治環境，普丁未來的繼位佈局與2007年與2008年的國會與總統大選，才是驅使俄羅斯對美及歐盟外交政策轉變的主要導因。詳見 Yu-Shan Wu,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 Studies*, no. 1 (March 2009): 117-162

⁶² J. Marcus, "Kosovo and after: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0.

個平等條約，並正式確立中國與俄友好關係。江澤民認為「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總結了發展中俄關係最主要的方針和原則，核心思想就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基礎上，發展長期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⁶³而俄羅斯外交部長伊凡諾夫(Igor Ivanov,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認為該條約基礎是「兩國長遠戰略利益的共通性」(commonality of the long-term strategic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⁶⁴。

(二) 摩擦(2001-2004)階段

由於普丁將優先發展俄羅斯經濟確定為俄羅斯的基本國策，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俄羅斯視此時機為打破自科索沃事件後之俄美關係停頓狀態的契機，而以支持美國反恐來換取俄美關係的穩定發展。⁶⁵

中俄關係卻因為中國欲透過國營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或稱「中石油」(“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or “PetroChina”)，來收購俄羅斯「斯拉夫石油公司」(Slavneft, Славнефть)股權遭到俄方排擠退出競標⁶⁶，和俄中遠東石油管道「安大線」(從安加爾斯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到中國大慶(Daqing, Дацин))方案遭到俄方擱置，並意圖改道日本所支持之「安納線」(安加爾斯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到納霍德卡(Nakhodka, Находка)港口)⁶⁷等俄羅斯國內能源戰略運作，在經濟合作面上出現了摩擦現象。2001-2003年，中國對俄羅斯發起的反傾銷案，就高達6件⁶⁸，而2004年11月，俄羅斯在中國的高度關切下，仍然允許達賴喇嘛入境⁶⁹。

但，在此摩擦階段，中俄關係的「戰略」性質仍高度顯現在中俄兩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制度建構。

⁶³ 江澤民，「共創中俄關係的美好未來——在莫斯科大學向俄羅斯各界知名人士發表的演講」，中國經濟網國務院公報，2001/07/17，詳見網站：

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

⁶⁴ “Russo-Chi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Now ‘At an Unprecedented High Level,’” ITAR-TASS, October 16, 2001.

⁶⁵ A. Cohen, “The Bush-Putin Summit Agenda: Russian Peacekeepers for Iraq?”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19, 2003,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3/09/Old-The-Bush-Putin-Summit-Agenda-Russian-Peacekeepers-for-Iraq>

⁶⁶ 2002年，在俄羅斯「斯拉夫石油公司」(Slavneft, Славнефть)拍賣案中，俄羅斯國家杜馬為此專門通過一項禁止外國國營公司購買俄羅斯私有化資產的決議，以合法的法律形式禁止「中石油」競標「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權。

⁶⁷ 根據中俄雙方1994年11月簽署的相關協議，「安大線」本該在2003年開工建設，但2002年底俄方卻又推出日本支持的「安納線」方案。

⁶⁸ 吳大輝，「尋找理想與現實間的平衡點：如何對待中俄關係中的摩擦」，*國際經濟評論*，2004年第3期。

⁶⁹ 1996年中俄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後，在中國的要求下，俄羅斯外交部一直拒絕達賴喇嘛入境。

2000年7月俄總統普丁訪華期間，中俄達成了軍事國防合作基本協議，合作項目包括合作研製新一代戰鬥機、地對地、地對空、空對空等系列導彈；合作研製雷射、束光、中子等高科技軍事裝備。中方也將派遣450名軍官到俄深造；舉行聯合軍演和實戰模擬高科技戰爭演習。⁷⁰在2000-2004年，在這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規武器購買國，略佔全球武器交易量的14%，而其中中國武器進口的95%來自俄羅斯，佔俄羅斯總出口武器量的45%。⁷¹

200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定期會晤，並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憲章」(SCO Charter, Хартии ШОС)。2003年中國、俄羅斯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進行了「聯合—2003」的反恐聯合軍事演習向國際社會證明，上海合作組織的實際行動能力正不斷加強。2004年1月5日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在北京正式成立。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制度建構上共同合作，也彰顯出中俄對於地區權力體系建構上的一致對外的「戰略」特質。

(三) 轉變熱絡(2004-2008)階段

由於2003年「尤科斯(Yukos, ЮКОС)事件」⁷²、2003年格魯吉亞(Georgia, Грúзия)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⁷³、2004年的「別斯蘭(Beslan, Беслáн)人質事件」⁷⁴和2004年烏克蘭的「澄色革命」⁷⁵(Orange Revolution,

⁷⁰ 李承紅，「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現狀、問題與對策」，俄羅斯研究，2009年第1期，頁92

⁷¹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 Book 2005: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⁷² 尤科斯公司(Yukos Oil Company,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 ЮКОС)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 Михайл Борýсович Ходоркóвский)2003年6月被捕入獄。2003年12月，尤科斯公司被宣佈為拖欠稅款的公司，並被要求向俄羅斯聯邦政府支付罰金，2004年12月尤科斯公司將其主要子公司 Yuganskneftegaz (Юганскнефтегаз)轉讓給 Rosneft 公司。這些事態發展預示著，俄羅斯聯邦政府打算最終解散尤科斯公司。俄羅斯政府將對一些石油生產、煉油和石油產品銷售於公司進行拍賣。2006年8月1日尤科斯公司被法院宣告破產。2010年尤科斯公司於歐洲人權法庭(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正式向俄羅斯政府提出訴訟。見 BBC News. "Yukos case against Russia begins at European court". 4 March 2010.

<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8549226.stm>.

⁷³ 2003年格魯吉亞(Georgia, Грúзия)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是2003年11月在格魯吉亞發生的反對當時總統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 Эдуáрд Амврóсиевич Шеварднáдзе)及其所領導政府的一系列示威活動，其領導人反對黨領袖薩卡什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 Михайл Николозович Саакáшв́или)每次公開露面都拿一枝玫瑰花，因此被稱為玫瑰革命。最終，薩卡什維利領導的反對黨獲得了勝利，建立了民主選舉的政府，其本人當選格魯吉亞總統，而原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納茲辭職。在2004年03月28日進行的格魯吉亞議會選舉中，薩卡什維利總統領導的政黨獲得全部150個議席。

⁷⁴ 「別斯蘭人質事件」是指2004年9月1日，車臣分離主義武裝分子在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學校製造的一起劫持學生、教師和家長作為人質的恐怖活動，到2004年9月3日事件結束，該事件造成了326人死亡，在俄羅斯國內造成很大影響，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普丁指出恐怖分子在別斯蘭市製造的人質事件是滅絕人性的，其殘忍史無前例。這是對

Помаранчева революція)，西歐與美國皆與莫斯科當局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立，甚致譴責與干預，而讓普丁在第二任時期外交方向產生了轉變，中俄關係自 2004 年開始，逐漸轉變熱絡，並展現在政治、軍事、能源經濟、社會與國際層面上。

政治層面上，2004 年 10 月普丁訪華期間，中俄簽訂「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⁷⁶中俄邊界糾紛在中國對領土主權問題不堅持下順利解決。同時，兩國元首並宣布建立國家安全磋商機制，2005 年 8 月，中俄兩軍在山東黃海和渤海附近舉行「和平使命-2005」(Peace Mission 2005)聯合軍事演習，這是首次俄方回應中方的軍事需求，被視為雙方戰略領域拓展的指標，2007 年 8 月，中俄更聯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中國的烏魯木齊和俄羅斯的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 Челябинск)舉行「和平使命—2007」(Peace Mission 2007)聯合軍事演習，此次規模為歷屆之最，參與兵力達 4000 多人。

經濟層面上，2006 年 4 月，中國希冀已久的中俄石油管道⁷⁷—「泰納線」，也就是目前也通稱的「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ESPO)(見圖 3)正式開工，俄方並承諾優先在第一段工程—泰舍特(Taishet, Тайшет)至斯科沃羅季諾(Skovorodino, Сковородино)結束後(2009 年 12 月 28 日竣工開通)，自斯科沃羅季諾建一條支線至中國大慶(2010 年 8 月 3 日已竣工開通)。

社會層面上，2005 年 7 月，胡錦濤訪俄，兩國元首宣布，2006 年在中國舉

整個俄羅斯、整個民族的挑釁，是對整個國家發動的進攻。而美國在象徵性地譴責恐怖分子的同時，卻表示不排除與車臣持不同政見者繼續接觸的可能，建議俄羅斯與車臣分裂主義人士談判和妥協，引起了俄羅斯強烈的不滿。

⁷⁵指 2004 年至 2005 年圍繞 2004 年烏克蘭總統大選過程中由於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直接進行選舉舞弊所導致的在烏克蘭全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件。在 2004 年 10 月 31 日的烏克蘭總統大選中由於沒有任何候選人達到法律規定的 50% 的多數，因此在同年 11 月 21 日在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尤申科(Viktor Andriyovych Yushchenko, Віктор Андрійович Ющенко)和亞努科維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ich, 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之間舉行重選。尤申科的選舉活動中使用橙色作為其代表色，因此這場運動使用橙色作為抗議的顏色。這個運動的標誌是橙絲帶和一面書有 Так! Ющенко! (「對！尤申科！」) 的旗。迫於這些抗議運動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這次重選的結果無效，並規定在同年 12 月 26 日重複重選。這次第二次重選受到嚴厲的觀察。烏克蘭國內和國際的觀察員均確認這次第二次重選基本上沒有任何問題。尤申科在這次重選中明顯以 52% 的結果獲勝。亞努科維奇獲 44%。2005 年 1 月 23 日尤申科入職，標誌著澄色革命的最終勝利。

⁷⁶新華網，「中俄互換《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2005/06/0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

⁷⁷俄羅斯遠東輸管線一直是備受外界矚目的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究竟將修建從中國建議的安加爾斯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到中國大慶(Daqing, Дацин)的「安大線」，還是從日本建議之安加爾斯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到納霍德卡(Nakhodka, Находка)港口的「安納線」，最後，俄羅斯不選擇中國建議的「安大線」，也不選擇日本建議的「安納線」，而決定了在「安納線」的基礎上作出的遠離貝加爾湖(Lake Baikal, озера Байкал)的修改方案—「泰納線」，也就是目前也通稱的「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ESPO)，除了涉及俄羅斯要在中國與日本的能源競合中維持「樞紐」的考量外，也涉及了俄羅斯重返亞太能源強權的權力體系與市場考量。

辦「俄羅斯年」，2007年在俄羅斯舉辦「中國年」，希望增進兩國人民對於雙方文化與歷史的了解。

國際層面上，2008年3月，北京奧運會前之中國鎮壓西藏暴動，5月，中俄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在美國與西歐的同聲譴責下，中俄雙方相互支持，貫徹戰略協作，在國際上連成一氣。

五、金融危機下的中俄關係(2009-2012)

2009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⁷⁸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中俄建交60周年慶祝大會暨中國「俄語年」閉幕式上表示，中俄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正向更高水平邁進。⁷⁹而綜觀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中俄關係，可發現在此危機下影響的中俄關係的發展特點有二：其一、在國際體系中更深化了中俄雙方的戰略合作，其二為挑戰美元地位，加強金融合作。

其一、在國際體系中更深化了中俄雙方的戰略合作方面，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強烈衝擊下，現行國際金融權力結構出現動搖，新興經濟體要求增加發言權的呼聲高漲，中國與俄羅斯把握時機把對單極世界結構的挑戰從政治領域擴大到了經濟領域，提出了改造單極經濟世界、建立多極經濟世界的主張，如在2009年4月首次在倫敦召開的G20高峰會議，就取代了原先的G7⁸⁰，另，在2009年與2010年G20會議中，俄羅斯聯合中國拋出議題，巴西跟印度舉手贊成，可以看出G20內部形成七大工業國與新興工業體兩大集團間的分配。⁸¹

其二、在挑戰美元地位，加強金融合作方面，2010年，中俄邊境貿易本幣結算順利啟動，雙方簽署「中俄經貿關係協定補充議定書」，中俄本幣結算擴大到一般貿易，兩國企業期待已久的人民幣和盧布掛牌交易已宣佈啟動。同年12月，中國和俄羅斯決定在雙邊貿易中放棄美元，改用人民幣和盧布進行結算，被

⁷⁸ 中國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始於1991年，但在蘇聯解體後，獨立的俄羅斯繼承了原蘇聯的國際關係，因此中國通常認為中俄建交已有60年歷史。

⁷⁹ 新華網，「溫家寶在中俄建交60周年慶祝大會暨中國『俄語年』閉幕式上的講話」，2009年10月14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0/14/content_12226503.htm

⁸⁰ 從國際關係來看，G20成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協調機制，成員從過去的七大工業國或八大工業國，擴大成二十大經濟體，最大的意義是：新興國家的勢力正式興起，取得與已開發國家同等的發言權。

⁸¹ 宋鎮照、張子揚、楊鈞池、洪敬富、馬祥祐、許菁芸、張義東、蔡育岱合著，*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新秩序—變動中的亞太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頁210

認為是「對美元地位的挑戰」。⁸²

六、新普丁時期的中俄關係(2012~)

俄羅斯社會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發展後逐步出現停滯趨向，現行的威權政治不僅阻礙了俄羅斯政治生態的良性發展，同時成為經濟轉型和創新的羈絆。面臨選前俄羅斯社會反威權主義，主張推進政治、經濟和福利改革的迫切需求，普丁勢必要在其第三個任期留下為公眾所認可的功績。所以為實現總統令中的經濟社會政策，俄羅斯必需融入全球經濟，俄羅斯需要亞太市場、資金、勞務、技術的參與，尤其與需要俄羅斯地緣經濟關係鄰近，且同為金磚國家的中國發展更密切的經貿關係。過去未了與西方維持穩定的關係，俄中對於雙方關係的發展均相對低調。然隨著當前世界地緣政治和經濟出現變化，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敘利亞、伊朗核問題和阿富汗等地區亦紛爭不斷，使得在國際事務上具有諸多相同的立場和利益的中俄雙方積極合作，相互支持與配合的情形也逐漸突顯。

在普丁就職後首次訪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北京峰會期間，中俄兩國在 2012 年 6 月 6 日發表《中俄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進一步落實未來十年中俄關係發展規劃：

(一)持續密切的政治合作：保持密切高層交往，完善議會、政府及部門間合作機制；完成 2009-201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制訂並批准 2013-2016 年實施綱要；在中俄戰略安全磋商機制框架內加強雙方在地區以及全球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

(二)提昇經貿關係：努力在 2015 年前將雙邊貿易額提高到 1000 億美元、2020 年前提高到 2000 億美元，同步提升經貿合作的品質，加強在投資、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太、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重點推動兩國戰略性大項目合作，擴大地方合作與企業交流；

(三)落實雙邊關係的社會基礎：制訂中俄人文合作行動計劃，舉辦好 2012 年中國「俄羅斯旅遊年」和 2013 年俄羅斯「中國旅遊年」活動，推動兩國青年經常性交往，包括協商確定未來 5 年互派青年代表團機制，落實好莫斯科大學 300 名青年學生今年暑期來華研修計劃，向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以及其他雙邊社會團體提供協助；

⁸² 中國評論新聞網，「中俄聯手拋棄美元，抗衡美霸權」，2010 年 12 月 1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7/101525753.html?coluid=2&kindid=4&docid=101525753&mdate=1201221647>

(四)加強雙邊安全合作：深化兩國邊境地區的合作；深化兩軍各層次、各領域合作，開展旨在提高兩軍協同能力和促進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的聯合軍事演習；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反恐、禁毒等領域的現有合作機制；在移民問題全面協作框架內完善條約法律基礎，以便利兩國公民合法往來，防範和打擊非法移民活動；通過密切協作，維護兩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俄羅斯外交傳統向來是歐洲重於亞洲，但從選前普丁對俄羅斯外交的規劃到就職後的3天訪華行程看來，普丁把中國放在了俄羅斯外交的重要位置，不僅在《俄羅斯與變化中的世界》一文中，首次將增強亞太地區的作用放在歐洲因素和俄美事務之前進行論述，普丁也發表了他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將成為俄羅斯外交最優先方向。因此重返總統職位的普丁面臨的重要的課題就是制定亞太戰略以及發展對華關係，尤其是俄羅斯已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意味著俄羅斯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也為中俄兩國經貿合作的深入發展帶來新契機，更有助於中俄經貿關係的提升與規範化；不僅關稅降低使雙邊貿易規模擴大，更重要的是俄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改善，俄市場將更加開放和透明，這對深化兩國高科技和投資合作、提升雙邊經貿合作的品質具有重要意義。

近十年來，中俄之間舉行多次的聯合軍演、邊境軍演及合作。在中俄繁多的雙邊公報中，皆公開表示雙方要攜手共進、世代友好及永不為敵。惟自中俄過去三百年來，抑或近一百五十的歷史來觀察，未來中俄之間誠可達到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並非無疑。當前俄中經貿關係從十年來，2001年雙邊的100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800億美元，依此數據來預測，到了2020年，將可達兩千億美元。從2001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後，中俄雙邊關係發展迅速，中俄雙方並開始舉辦中國年、俄國年、漢語年、俄語年及中俄年等活動，包括大型的聯合軍演。2007年，中俄雙邊解決了邊境問題。2008年，雙邊發表公報，簽署兩國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段的補充敘述議定書及其附圖，而雙方將來會長久維持該議定書之遵守。現任的俄羅斯總統普丁，預計他在位影響俄國的對外政策與中俄關係將至2024年。而台俄之間則係自1990年代便開始來往，我國曾經派員訪問莫斯科，1996年莫斯科在台北成立莫北協會。1992年台俄之間的貿易只有三億多，但截至去年已成長到(2011年)40億美元，因此對台灣來說，俄羅斯的商機無窮。由於中俄雙方快速成長的經貿關係，使得未來至中國大陸發展的台商或台灣人才須加深對俄國的認識，甚至須學習俄文來因應所需。

肆、中俄關係的轉變與深化—機制化平衡分析下的權力分布與互賴

一、中國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一)中國決策者主觀認知上的國際權力分布

卡普蘭(Morton A. Kaplan)認為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係指國際間若干相互關聯的變數，而於外在環境不變的情形下，具有影響及左右成員行為之功能；⁸³而霍斯第(K.J. Holsti)認為國際體系係指由獨立的政治單位所組成的集合體，這些獨立的政治單位則係依據規範化的過程進行經常性的互動。⁸⁴自三十年戰爭結束後，以主權國家為單元的威斯特伐利亞(Peace of Westphalia)體系正式形成近代國際體系，發展到19世紀的權力平衡體系(balance of power)，20世紀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兩極體系(bipolar)，冷戰結束後則轉為單極多元的體系。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漫長，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降，以天朝上國自詡的中國遭遇一連串的巨變後，始逐漸產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認知。

對於中國在國際權力分布的認知方面，中國認為1960年代的冷戰時期雖屬於緊密的兩極體系，而第三世界勢力、中國、西歐及日本亦為重要的國際權力中心，這些美蘇外的權力中心將使兩極無法有效地控制世界。而後於冷戰尚未結束時，鄧小平即於1990年3月表示：「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不管它怎麼削弱，甚至有幾個加盟共和國退去。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能貶低自己，中國也算一極。」⁸⁵從鄧小平的說法中可看出，中國在冷戰尚未結束時，即認為國際的權力分佈已為多極格局。而在冷戰結束後的1992年中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亦曾說：「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行程將是長期及複雜的過程。」⁸⁶賀凱認為，中國當局在1990年代仍主要以多極來看待未來國際的權力分佈發展，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的崛起乃不可避免，亦將有助於世界和平；其二，中國的經濟學家認為，觀察美國在1990年的經濟表現，顯然可預見美國的衰退，特別顯示在財政與貿易赤字上；其三，多極格局廣泛被認為相較於兩極與單極具有道德性質，有益世界和平的促進。⁸⁷

⁸³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7), p. 20.

⁸⁴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3), p. 96.

⁸⁵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53。

⁸⁶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收於中國共產黨主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1。

⁸⁷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pp. 18-19.

然而中國對於多極格局的憧憬卻由於科索沃戰爭而改觀，在 1999 年的北約空襲科索沃事件中，突顯出俄羅斯的無力與美國的能力，尤其近年北約的東擴更使美國的勢力擴張至該區。北約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手段的運用，亦使以安理會決議為武力使用合法性基礎的聯合國規範受到嚴峻挑戰，開啟了「潘多拉的魔盒」。因此，科索沃事件過後，中國開始認清多極化格局的困難與現實，接受了以美國單極為主的國際權力分佈事實。江澤民在 1999 年 5 月 30 日公開表示：「冷戰過後，國際體系雖朝多極化邁進，但於短期之內達成仍有其困難性。」。2000 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明白指出，美國與其它強權的軍事實力差距仍存在，且以美國為領導的單極世界依然存在而非衰退。這是中國承認以美國為主的單極體系存在之明證。⁸⁸

中國於 2000 年後經濟突飛猛進，帶動整體實力的崛起，而崛起後的中國亦逐漸改變其國際權力分佈的認知，2008 年的金融海嘯重創美國，導致嚴重經濟衰退，而斯時的中國仍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袁鵬認為，2008 年為國際體系的分水嶺，金融海嘯重創美國，使得原本的單極格局轉為「後美國時代」，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亦逐漸形成「老大與老二」的關係。⁸⁹不過如此的認知仍尚未脫離以美國為首的單極格局，僅是單極與其他強權的實力距離拉近而已。

(二)經濟互賴程度

根據賀凱的見解，行為國與目標國的經濟互賴程度將決定行為國採取制衡的手段，係以傳統的權力平衡或機制化平衡，而經濟互賴的程度則以三項指標為判斷準據，即直接投資額、貿易總額及中美的雙邊貿易額。

1.外國對中國之直接投資額

從 1995 年起，外國對中之直接投資即呈穩定成長，雖然 1997 年至 1999 年呈現停滯或倒退的情形，惟 2000 年以後，即出現快速成長。2008 年爆發金融海嘯致使投資額銳減，2010 年情形才逐漸回穩。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912.82	732.76	510.03	521.02	412.23	623.80	691.95	827.68	1,150.69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⁸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2000 年 10 月。

⁸⁹ 袁鵬，「國際體系變遷與中國的戰略選擇」，現代國際關係，第 11 期(2009 年)，頁 39-42。

1534.79	1,890.69	1,937.27	1,600.51	1,751.47	1,142.14	1,850.80	N/A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The Wor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KLT.DINV.CD.WD								

2. 中國貿易額之成長

由表 3 中可知，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自 1995 年起呈現穩定成長，僅有在 1998 年及 2009 年重現兩次負成長，1998 年的負成長至多僅能算是停滯而已，比較明顯的負成長出現在 2009 年，主要原因仍係受到 2008 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嘯衝擊，使得全球的進出口活動大幅銳減。於 2010 年又重回穩定成長。

表 3 中國貿易總額及成長百分比(單位：億美元)		
年份 項目	貿易總額	成長百分比
1995	2,808.6	N/A
1996	2,898.8	3.2%
1997	3,251.6	12.1%
1998	3,239.5	-0.3%
1999	3,606.3	11.3%
2000	4,742.9	31.5%
2001	5,096.5	7.4%
2002	6,207.6	21.8%
2003	8,509.8	37.0%
2004	11,545.5	35.6%
2005	14,219.1	23.2%
2006	17,604.4	23.8%
2007	21,737.3	23.5%
2008	25,632.6	17.9%
2009	22,075.4	-13.9%
2010	29,740.0	34.7%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數據庫 http://219.235.129.58/reportYearQuery.do?id=2100&r=0.06401750675866902		

3. 中美的雙邊貿易額

中美雙方的貿易額，自 1997 年起即進入每年二位數百分比成長，2004 年更達到了 34.2 的高峰，其後則成長趨緩，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影響，首度呈現負成長，而翌年隨即回復成長。

年份 項目	貿易總額	成長百分比
1995	408.29	N/A
1996	428.39	4.9%
1997	490.16	14.4%
1998	549.36	12.0%
1999	614.25	11.8%
2000	744.62	21.2%
2001	804.84	8.0%
2002	971.83	20.7%
2003	1,263.32	30.0%
2004	1,695.98	34.2%
2005	2,115.12	24.7%
2006	2,626.59	24.2%
2007	3,020.67	15.0%
2008	3,337.43	10.5%
2009	2,982.62	-10.6%
2010	3,853.85	29.2%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數據庫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sj/>

(三) 中國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從上述中國的各項數據可知，外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中美貿易總額的成長及中國的貿易總額皆逐年穩定上升，意味著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無法自外於國際的經濟互賴關係，從而揚棄傳統的權力平衡戰略改採機制化平衡戰略。而中國領導人的國際權力分佈認知，亦影響中國機制化平衡戰略之選擇，從冷戰甫

結束時鄧小平認定的多極化格局，經歷科索沃事件過後，中國始逐漸認清多極化格局的現實困難性，開始接受以美國單極為主的國際權力分佈事實。2000 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即明白指出，美國與其它強權的軍事實力差距仍存在，且以美國為領導的單極世界依然存在而非衰退。

由於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進而帶動整體實力的崛起，亦逐漸改變其國際權力分佈的認知，而同時金融海嘯重創美國，致其經濟嚴重衰退。在此消彼長的情形下，某些學者認為，2008 年為國際體系的分水嶺，金融海嘯後的美國，使得原本的單極格局轉變為美國與中國的「老大與老二」關係。不過如此的權力分佈認知仍尚未脫離單極格局思維，僅是單極(超級強權)與其他強權的實力距離縮小而已。而此種單極的權力分佈認知已影響到中國的機制化平衡，使其對美國採行「排他型」機制化平衡戰略。

二、俄羅斯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一)俄羅斯領導人的國際權力分佈認知

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原先的兩極體系崩壞，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瞬間一落千丈，此時的俄羅斯在經濟上極需外援，因此外交政策係以親西方為主，藉由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合作與援助，挽救其嚴峻經濟情勢。在政治上，俄羅斯則希望藉由西方國家對其民主改革之支持，進而建立雙方多邊外交關係。在 1995 年 12 月的國家杜馬大選中，以俄羅斯共產黨為首的左翼政黨勝出，成為國家議會下院之最大黨，不僅使葉爾欽 1996 年的總統連任之路蒙上陰影，亦嚴重影響葉氏第二任期內的政策推行。面對內部政敵的壓力，葉氏對內尋求菁英的支持，對外則尋求西方國家的援助，並於 1996 年 1 月任命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為外交部長，普氏認為世界的權力分佈係朝向多極化格局發展，並主張多極化外交政策，對外尋求國家地位的提升，對內則順應民族主義的思潮。此外，為修改俄羅斯的親西方外交政策，提出「大歐洲」外交政策，「大歐洲」指的係包括俄羅斯的歐洲，主張歐洲事務應由，「歐洲人」自主決定，反對美國干預歐洲事務，藉由與西方大國發展多極化外交，來抑制美國與北約對俄羅斯的孤立。俄羅斯與東方國家除了在歷史文化上具有同質性，在經濟上亦具有互補關係，又共同面臨美國的獨霸。因此拉攏東方國家以制衡西方勢力便成為此時期主要的外交方針。⁹⁰

⁹⁰ “Годы в политике: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написал свою книг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http://www.ng.ru/style/1999-12-09/16_years.html> (December 9, 1999).

而 1997 年 12 月公佈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指出，當前國際局勢具有兩大矛盾，這兩個矛盾影響世界權力分佈的發展：其一為在世界各國及多邊組織努力下的多極化格局趨勢；其二則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單極體系，而俄國的主要外交方針即在多極化趨勢中發揮大國地位影響力。⁹¹很顯然地，俄羅斯對於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有所了解，並欲以提升自身地位來促進多極化格局的產生，以達到制衡美國的效果。1999 年 12 月普丁代理總統職務之初，曾發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文中表述了「俄羅斯思想」，認為當前俄羅斯的問題不僅屬於經濟問題，同時兼具政治與意識形態性質，缺乏全民的共識和團結。為此，普丁提出了四個口號：「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作用」和「社會團結」。其主要的對外戰略思維是以重振國家經濟和恢復昔日大國地位為目標，對外推行實用主義外交政策，企圖突破西方國家的遏制。在外交政策仍延續東西並重的雙頭鷹政策，將已定位為「歐亞大國」。

(二)經濟互賴程度

1.外國對俄羅斯之直接投資額

外國在俄羅斯的直接投資額，自 1995 年至 2010 年為止，增長了 21 倍，顯示俄國對外的依賴程度倍增，即使 2008 年的俄國出兵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及金融海嘯重創外國投資人的信心，使 2009 年的投資額銳減一半，至 2010 年又逐漸回復穩定成長局面。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65	25.79	48.64	27.61	33.09	27.14	27.48	34.61	79.58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54.44	128.85	297.01	550.73	750.02	364.99	432.87	N/A	

資料來源：“Russi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ex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facts/russia/foreign-direct-investment>> (August 17, 2012)

2.俄羅斯貿易額之成長

⁹¹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7),” *Encyclopedia Terroristica*, <<http://terroristica.info/node/208>> (August 17, 2012).

自表 5 可得知，俄羅斯於 2000 年以前的對外成長緩慢，惟自 2000 年以後即呈穩定且迅速成長，短短 10 年之間貿易總額卻出現 4 至 5 倍的增長，且 2006 年以後，除了金融海嘯的影響外，每年皆呈現 20% 至 30% 的成長率，顯示俄國對外貿易上的依賴日漸增加。

表 6 俄羅斯貿易總額及成長百分比(單位：億美元)		
年份 項目	貿易總額	成長百分比
1995	1450.3	N/A
2000	1499.0	N/A
2005	3692.4	N/A
2006	4678.0	26.7%
2007	5779.3	23.5%
2008	7635.2	32.1%
2009	4952.1	-35.1%
2010	6489.1	31.0%

資料來源：“[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анным тамож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trad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trade/#>> (August 20, 2012).

3.美俄的雙邊貿易額

美俄雙方的貿易額，於 2000 年以前成長速度緩慢，直至 2005 年後始大幅進步，2010 年已增長為 235.68 億美元，顯示美俄之間的貿易關係熱絡，且以回復至金融海嘯前的水準。

表 7 俄美貿易總額及成長百分比(單位：億美元)		
年份 項目	貿易總額	成長百分比
1995	69.63	N/A
2000	73.38	N/A
2005	108.86	N/A
2006	150.43	38.1%
2007	178.05	18.3%

2008	271.47	52.4%
2009	183.02	-32.5%
2010	235.68	28.7%

資料來源：[“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анным тамож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trade/#)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trade/#>> (August 20, 2012).

(三)俄羅斯的機制化平衡戰略

依照前述所得，俄國不管在外國的直接投資額、貿易的總額成長及美俄之間的貿易關係上皆具有大幅成長，顯示俄國當前與國際的經濟互賴程度高，在對於目標國(美國)的制衡上必定無法採取傳統的權力平衡策略，而係轉而採取機制化平衡的戰略。而在機制化戰略的採擇上，根據 1997 年 12 月公佈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俄羅斯當局認為當前國際局勢具有兩大矛盾，其一為在世界各國及多邊組織努力下的多極化格局趨勢；其二則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單極體系。顯然俄國對於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有所了解，並欲以提升自身地位來促進多極化格局的產生，以達到制衡美國的效果，因此俄國係採取單極體系認知下的排他性制衡策略來制衡目標國。

三、中俄關係之機制化平衡分析

由以上分析，中俄於 2000 年之國際的經濟對外依存度高，且雙方對於國際權力分佈的認知又同為以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因此在機制化平衡上的戰略上皆選擇以排斥的方式來制衡共同目標國—美國，且在經濟上的互動也趨於頻繁，更由於「泰納線」中國支線的啟用，更加強了雙方的經貿往來與合作。因此，本節將以美國因素、經貿互動與能源政治來說明中俄關係之機制化平衡分析。

(一) 美國因素

冷戰結束後，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體系(US-centered unipolar system)⁹²，而區域內強權間的合作與衝突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關注焦點。於是，Huntington 將 20 世紀 90 年代後冷戰的國際體系描繪成一個「一超多強」(uni-multipolar

⁹² Brooks, Stephen G.,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1(4), 2002, p.27.

system with one superpower and several major powers)⁹³體系結構，而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Yevgenii Primakov, Евгé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也針對美國的超強獨霸提出「多極化」(Multipolarism)概念，但有些學者對於多極模式(Multipolarity)卻持懷疑的看法，認為多極模式為幾個主要強權可能根據本國利益、而不是國際準則和標準在地區範圍內競爭與合作，為了實現目標，它們通常會組成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對多邊機制加以利用，而這種模式可能產生相當危險且不穩定的局面。⁹⁴但，多極化卻也成為中俄友好關係的基石，在國際與區域權力體系上，中俄關係的「戰略」特質，有極大的因素是反映在中、俄於區域權力體系多極模式與抵制美國權力於東亞區域擴張的中、俄、美三角關係的博弈上，尤其是美、中、俄三個權力中心皆有意要涉足的東南亞國協的區域權力競逐。

再者，條約的簽訂不免是兩個或多個簽約國認知到有共同敵人，且希望能共同抵禦敵人，中俄兩國的「共同敵人」正是美國與其同盟國⁹⁵，對中國而言，除了美-台-中三角議題外，與美還有許多貿易上的爭端；對俄國而言，撇除冷戰時期與美國的恩怨不論，美國近期以來在伊拉克及前蘇聯地區的大動作，已經觸動到俄國的敏感神經，如2007年美國對伊拉克進行預防性戰爭以及美國對喬治亞和烏克蘭地區顏色革命所進行的補助，此兩舉動促使俄國繃緊神經，擔心美國政治及軍事上的力量侵入前蘇聯的領土，而俄國之所以如此擔心其實是源自於俄國人衛星國的概念，一旦有敵人入侵其「勢力範圍」便會觸動其警戒線，而俄國在美國這些舉動之後，轉向與中國親近，其目的在於與美國抗衡及找尋盟友共同抵禦美國的思想。因此，促使中俄兩國戰略匯集的主要原因是因應美國在東方佈署的「美日安保」對中國的圍堵策略與突破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東擴」，對俄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的壓縮。此外，在國際合作領域中國同支持建立國際新秩序、世界多極化發展，除使雙方能在多極化格局中有更大發展空間，同時亦可相互聲援，打消美國氣焰，並能提高雙方各自在國際聲望與區域影響力。

總而言之，歐洲經濟的危機以及俄美關係的惡化固然促使俄羅斯外交轉向亞太，提升與中國的關係發展，但是面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競爭的壓力，也不會讓俄羅斯政府大意對待。對於新普丁時期俄羅斯在俄中美的三角關係中該如何應對，俄羅斯專家有「聯美制華」與「聯中制美」兩派意見。儘管目前以「聯中制

⁹³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36-37.

⁹⁴ Vladimir Frolov and Andrey Seregrin, "The Multipolarity Trap: How Russia Should Make Friends...and with Whom?" *Moscow Defense Brief*, No: 2, 2007, pp. 19-24.

⁹⁵ John Daniszewski, "Far East Void Eats at Russia,"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 2001.

美」得到俄羅斯大部分學者乃至決策高層的贊同，主張加強俄中等國之間的戰略協作，以及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框架內的協作，平衡美國及其盟國的影響；不過普丁也看到俄羅斯面臨中國的崛起的挑戰，並會透過在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項目、在莫斯科的主導下尋求與中亞國家一體化，並擴大到印度與越南以尋求中國平衡的關係

(二) 中俄兩國經貿現況

從 1992 年至今，中俄經貿合作大致經歷了兩個主要時期：1992-1998 年為雙邊貿易波動時期，1999 年至今為雙邊貿易成長和快速發展時期。這兩個時期又可分為四個階段：1992-1993 年為第一階段。在該階段中兩國貿易方式以政府協定貿易和企業之間以貨易貨的貿易型態為主，1993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76.7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1994-1996 年為第二階段，在該階段，雙邊貿易方式逐漸地往現匯貿易的型態過渡，貿易規模有所下降，1996 年為 68.3 億美元。1997-1998 年為第三階段，在該階段，雙邊貿易額繼續下滑，1998 年降至 54.8 億美元。1999 年至今為第四階段，在該階段，雙邊貿易恢復成長並進入快速發展進程。

全面發展經濟，改善週邊國家關係，營造有利的內外環境，有助於中、俄各自經濟利益。中國在政治及經濟崛起後，挾著強大經濟力展現其大國力量，然其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多的資源及市場，而俄羅斯在解體後要重返大國之林也需要重建其經濟，因此在各有所需之下兩國合作可說是一拍即合，貿易量日漸增加(見表 8)。

表 8、：1992~2009 年俄羅斯對中國進、出口貿易

單位：億美元

年成長率(%)

年度	貿易總額	出口值	進口值	貿易盈餘	總額成長率	出口成長率	進口成長率
1992	58.6	35.3	23.4	11.9	50.3	69.2	28.6
1993	76.8	49.9	26.9	23.0	31.0	41.4	15.0
1994	50.8	35.0	15.8	19.2	-33.9	-29.7	-41.3
1995	54.6	38.0	16.6	21.4	7.5	8.6	5.1
1996	68.5	51.5	16.9	34.6	25.3	35.5	1.8
1997	61.2	40.8	20.3	20.5	-10.5	-20.8	20.1
1998	54.8	36.4	18.4	18.0	-10.5	-11.0	-9.4

1999	57.2	42.2	15.0	27.2	4.4	16.0	-18.5
2000	80.0	57.7	22.3	35.4	39.9	36.7	48.7
2001	106.7	79.6	27.1	52.5	33.3	37.9	21.4
2002	119.3	84.1	35.2	48.9	11.8	5.6	29.9
2003	157.6	97.3	60.3	37.0	32.1	15.7	71.4
2004	212.3	121.3	91.3	30.3	34.7	24.7	51.0
2005	291.0	158.9	132.1	26.8	37.1	31.0	45.2
2006	333.9	175.5	158.3	17.2	14.7	10.5	19.8
2007	481.6	196.7	284.9	-88.2	44.3	12.1	79.9
2008	568.3	238.3	330.1	-91.8	18.0	21.0	15.9
2009	388.0	212.8	175.1	37.7	-31.8	-10.7	-47.1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中俄合作－合作簡介－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http://ru.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004/20100406868045.html>；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統計－中國與歐洲國家貿易統計表，

<http://ozs.mofcom.gov.cn/date/date.html>，轉引自洪美蘭，「俄羅斯的國際貿易活動－兼論其與中國貿易關係之發展」，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慶祝創系八十周年「國際政治經濟學與金磚四國」研討會，2010年10月22日，頁11-12

中國是俄國的第3大貿易伙伴，而俄羅斯則是中國的第14大貿易伙伴。俄羅斯國民生產毛額總值排名世界第9位，擁有約1.43億人口。中國國民生產毛額總值排名世界第2位，擁有約13.4億人口。

依照世貿組織的界定，中俄貿易包括一般貿易、邊境貿易和加工貿易三種方式，其中一般貿易為當前最主要形式。作為輔助形式的邊境貿易，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採用一般貿易的方式。三種貿易方式分別約占雙邊貿易額的70%、20%和10%。

從2000年到2011年雙邊貿易額增長了10倍。根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2011年俄羅斯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較去年同期比較增加了42.7%，為792億美元，俄羅斯出口403億美元（+55.6%），進口389億美元（+31.4%）。兩國領導人在2010年宣布在2015年前要將中俄貿易額提高到1000億美元，到2020年時希望兩國貿易額能提高到2000億美元。

2011年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原油及石油產品（50.55%）；原木及木材（8.65%）；礦石（8.31%）；有色金屬（7.60%）；化工產品（6.40%）；海產（3.94%）；肥料（2.82%）；紙張和紙漿（2.26%）；機電產品（0.70%）；黑色金屬（0.53%）。

2011年俄羅斯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有：機電產品（40.91%）；服裝（10.61%）；化工產品（9.28%）；鞋（6.34%）；黑色金屬（3.30%）；毛皮（3.00%）；家具、照明設備（2.12%）；玩具、體育用品（1.85%）；床單、窗簾（1.80%）；皮革製品（1.69%）。

從上述資料看出中國提供俄羅斯的主要是民生物資與糧食產品，約占俄羅斯民生用品的八成市場。然而因為有為數眾多的跑單幫在統計上會被漏掉，所以在檢視雙方經貿的官方統計數據會有一個需要注意的隱藏數字，因此估計約有5到10億美金的誤差。

中國對俄投資主要分布在礦產資源、林業、貿易、家電、通信、建設、服務等領域。

2004年中國商業部核定47件中國赴俄羅斯投資案，投資金額約1.4億美金，歷年來赴俄總計的投資金額至2004年為止是6.8億，僅佔中國對外投資的5%，而到2008年時中國對俄羅斯累計直接投資為2.4億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國對俄羅斯累計直接投資為16.14億美元。因此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俄中第九次定期會晤期間表示中國對俄投資總額到2020年將達到120億美元之譜。

目前中國對俄羅斯的投資多集中於俄國的遠東區域，例如Khabarovsk與Primorsk區，投資性質以貿易商為主，逐漸地有朝向餐飲、旅館業投資的趨勢。中資在俄羅斯投資的主要障礙是俄羅斯的投資環境不佳及對中商的保障不足，為了改善此問題，雙方便簽署一連串的投資保障協定，討論租稅與移民政策，並促成投資計畫；另一項影響投資的難題則是俄羅斯不同區域之間有關投資機會方面的資訊不足，因此對俄投資難以成長。中俄兩國中央政府也希望改變這種雙邊貿易不平衡的狀況。兩國領導人2009年批准一項合作規劃綱要，旨在全方位促進中國東北地區同俄遠東及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合作。

近年來，中國企業對俄國投資持續成長。2004-2007年先後在俄羅斯及中國由俄羅斯經濟發展部及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舉辦四次俄中投資促進會議。上述投資促進會議期間，簽定32個在俄羅斯投資的雙邊合作協議，投資總金

額為35億美元。其中最大項目為：聖彼得堡「波羅的海明珠」綜合社區開發（中方投資額為13億美元）；外貝加爾邊疆區的赤塔州紙漿廠（5億美元）；托木斯克州木材深加工基地（4億美元）；外貝加爾邊疆區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鐵、鉛、金礦開採等。2009年3月27日兩國副總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五屆俄中投資促進會議。會議期間雙方企業簽署了4條投資協議，在俄羅斯外貝加爾邊疆區、濱海邊疆區建立木材深加工基地，在中國生產利用俄羅斯管道壓力控制技術的設備。第五屆俄中投資會議項目的投資總金額為4.55億美元。

從長期發展趨勢來說，雙方經貿合作將在兩國戰略合作關係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成為中俄雙邊關係中最活躍的一部分。尤其是俄羅斯於2012年8月22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第156個成員國之後，俄羅斯須同意減少食品和汽車等進口產品的關稅，並放寬對進入俄國金融和電訊部門海外公司的控制。換言之，俄羅斯市場將逐步開放與放寬管制，這對已經對俄羅斯有相當投入的中國將會是正面的消息

(三)中俄能源政治與合作

Suh認為雙方同盟將產生專屬財產，而所謂專屬財產有不可流通性，致使雙方終結同盟時，將耗費過鉅之機會成本，進而穩固同盟關係。專屬資產可分為四大類：設備、過程、人力資產及區域專屬，其中模型中的專屬資產係專指設備方面，而中俄之間的天然氣鋪設即為專屬財產之一。歐洲原為俄羅斯的天然氣主要輸出對象，然而在歐洲內部國家陸續生產天然氣，以及為了能源安全因素轉向中東、非洲國家尋求供應，導致俄羅斯將天然氣出口對象朝向中國。在中俄的天然氣合作上，一直無法取得共識，其主要原因係因為價格過高，中國無法接受。2009年歐洲國家遭逢金融風暴，對於石油的需求量銳減，連帶影響到天然氣的價格。在俄羅斯天然氣價格大幅降低的情形下，中俄的天然氣合作得以再現曙光。

2009年10月與12月，中俄雙方分別簽署「關於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天然氣的框架協議」及「關於俄羅斯向中國供應天然氣基本條件的協議」，確立了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天然氣的基本商業和技術指標。俄羅斯預計於2014年至2015年開始向中國供應天然氣，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總裁阿列克謝·米勒透露，根據上述協議，未來俄羅斯將每年向中國輸送700億立方米天然氣。而俄中天然氣的輸送管線將分為西線與東線，西線方向每年可供應約300億立方米；東線方向則約380億立方米。西線方案將利用西西伯利亞的資源基礎，而東線則利用東西伯利亞、薩哈林大陸架及遠東的天然氣田。

而俄羅斯前總統暨現任總理普丁就一直計畫要以能源強權擴大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角色和地位，也一直將「以能源強權重返亞太」做為目標。⁹⁶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龐大能源需求，對俄羅斯來說，和日本及其他東北亞國家皆是其未來原油出口的潛在市場。

在能源部分，根據2009年4月兩國政府簽署的石油領域合作協議，2009年5月18日俄中原油管道正式開工建設。管道起自俄羅斯遠東原油管道斯科沃羅季諾分數站，途徑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13個縣市區，止於大慶末站。管道全長1030公里，預估年輸油量1500萬噸，從2010年底開始運作。2011年通過此管道從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原油量為1397萬噸。

俄中能源合作自1950年代初期開始，當時是由蘇聯提供中國發展現代石油工業的科技與技術，而此種援助在1958年俄中關係惡化時就停止了。而在這之後的數十年，兩者皆各自發展自身的石油和天然氣工業。俄羅斯成為歐洲主要的天然氣出口國，而中國則成為東亞主要的石油出口國。

這樣的情況在1990年代初期有了改變。這樣的改變有兩個因素，一是蘇聯解體，使新獨立的國家，包括俄羅斯，開始政策的轉變。二是中國成為純粹的石油進口國，且開始了解增加使用天然氣作為能源供給的潛在利益。於是，在1990年代中期，俄中公部門與能源公司都認為建構自俄輸中的主要油氣管線是當前必行的措施。⁹⁷

且從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中俄雙邊關係在摸索中前進，由於雙方在國際體系運作上，對一些國際議題上，尤其是區域安全議題，在美國的介入下，雙方的合作意願與看法日漸趨同，雙方合作可獲得的利益亦有增加的趨勢，因而形成中俄合作日益密切的互動結構。

1996年4月23日葉爾欽在訪問中國的路上，將先前中俄聯合聲明中的「要發展長期、穩定、睦鄰友好、相互合作、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to develop long-term, stable, good-neighbor, mutually cooperative,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facing the 21st century”)修正為「發展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to develop an equal and trustworthy strategic partnership

⁹⁶ Rozman, G. (2008)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ussian Far East: a resurgent Russia eyes its future in northeast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5(1),36-48.

⁹⁷ Herman Pirchner Jr, "The Uncertain Future: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kratizatsiya*, Vol.16, No.4, October 2008, p.310

oriented toward the 21st century”)⁹⁸，而這也是第一次，俄羅斯和中國公開宣示雙邊將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兩國展開全面合作，對具有高度戰略性的區域及國際議題加強彼此溝通，合作範圍及內容皆大幅擴展。兩國建立元首定期會晤機制，為兩國全面交往及各領域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另兩國總理層級定期會晤機制亦自1996年12月正式啟動，專責研商兩國經濟合作問題。⁹⁹

David Kerr(2005)認為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字面意義遠大於實際性質，雖然，其關係的產生與美國之冷戰後的單邊外交政策走向息息相關，但與美抗衡另一層意義就是願意負擔實際成本，這意味著不僅是國內資源重新定向的成本，也包含著引起霸權不滿的成本。¹⁰⁰

但，姑且不論雙方的夥伴合作關係是否穩固，中俄兩國於2004年10月簽訂「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¹⁰¹中俄邊界糾紛在中國對領土主權問題不堅持下順利解決，其主要考量應該是拉攏俄羅斯能源合作之目的，因此，中國的能源需求安全很明顯是中國置於與俄羅斯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主要支柱。

中國的能源現狀總體來說是擔憂超過樂觀。自1993年中國由石油出口國變為石油進口國之後，中國的石油需求一直在不斷上升。2003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以及僅次於美日的第三大石油進口國。2009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國。2015年中國的石油需求量將達4億2千萬噸。¹⁰²到2030年，中國可能需要每年進口6億多噸石油，是國內石油生產量的3倍。在此同時，中國對於天然氣的需求也快速成長，雖然，在中國整體的能源架構上，最主要依賴的能源為煤，煤業及相關能源產業結構大大地排擠到天然氣的市場建立，但中國當局開始察覺到增加使用天然氣可為其工業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中國境內天然氣產量稀少，因此，勢必要大量進口天然氣。

中國自911事件後，對於能源安全極端重視，原因有二，一是中國的原油來

⁹⁸ Li Jingjie, “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in Sherman W. Garnett, ed., *Rapprochement of Rivalry?-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p. 88.

⁹⁹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九卷第三期，2008年7月，頁109。

¹⁰⁰ David Kerr,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5) 49, 411-437

¹⁰¹ 新華網，「中俄互換《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2005/06/0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

¹⁰² OECD/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8*.pp.191-193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源最主要來自於政治紛爭不斷與戰爭風險的中東地區(高達 55%)，而美國藉由伊拉克戰爭大幅度地掌握了中東地區的石油控制權，使得中國的原油供給大幅度受到牽制。二是中國自中東、非洲和亞太的原油海運路線都要經過水道狹窄、且是美國全球戰略明確必需控制的通道之麻六甲海峽，以及連接波斯灣和印度洋、情勢不穩定的荷姆茲海峽等戰略要地，令中國倍感威脅。¹⁰³

中國的能源赤字(預估每年達到 7000 萬桶的石油)，再加上中國國家能源安全的需求，使得兩國的能源關係快速成長。中國對俄羅斯能源的需求代表中國需要增進自身的能源安全，以免受到國際石油供給的牽制，而這也代表俄國必須增加對中國石油生產和輸送的能力。因此中俄聯合計劃石油管線就是為了確保石油貿易盡可能的快速成長。

1. 從「安大線」、「安納線」至「泰納線」:「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Eastern Siberia to the Pacific pipeline, 簡稱 ESPO; Нефтепровод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 Тихий океан", 簡稱(ВСТО))

俄羅斯遠東輸管線一直是備受外界矚目的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究竟將修建從中國建議的安加爾斯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到中國大慶(Daqing, Дацин)的「安大線」，還是從日本建議之安加爾斯克(Angarsk, Ангарск)到納霍德卡(Nakhodka, Находка)港口的「安納線」，最後，俄羅斯不選擇中國建議的「安大線」，也不選擇日本建議的「安納線」，而決定了在「安納線」的基礎上作出的遠離貝加爾湖(Lake Baikal, озеро Байкал)的修改方案—「泰納線」，也就是目前也通稱的「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ESPO)(見圖 3)，但優先在第一段工程—泰舍特(Taishet, Тайшет)至斯科沃羅季諾(Skovorodino, Сковородино)結束後(2009 年 12 月 28 日竣工開通)，自斯科沃羅季諾建一條支線至中國大慶(2010 年 8 月 3 日已竣工開通)。除了涉及俄羅斯要在中國與日本的能源競合中維持「樞紐」的考量外，也涉及了俄羅斯重返亞太能源強權的權力體系與市場考量。

「泰納線」的起點改在了距安加爾斯克西北約 500 公里的泰舍特(Taishet, Тайшет)，該管線穿越貝加爾湖北部，然後沿著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簡稱貝阿鐵路, Baikal-Amur Mainline, 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南下，途經 Kazachinskoye(Казачинское)和斯科沃羅季諾(Skovorodino, Сковородино)，並沿著俄中邊境地區一直通向納霍德卡附近的科濟米諾灣(Kozmino, Козьмино)。「泰納線」的管道設計總長度為 4130 公里，途經伊爾庫茨克州(Irkutsk Oblast,

¹⁰³ Andrew Andrews-Speed, Xuanli Liao, Roland Dannreuth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Ир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阿穆爾州(Amur Oblast,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Khabarovsk Krai, Хабáровский край), 至濱海邊區(Primorsky Krai, Примóрский край), 管道的年輸油設計能力為 8000 萬噸, 輸油管道的直徑為 1220 毫米, 沿途修建 32 個油泵站。

「泰納線」設計的輸油能力是每年運輸 8000 萬噸石油, 其中 5000 萬噸運往納霍德卡, 然後通過太平洋運至日本等地, 另外的 3000 萬噸準備運往中國。就中國雖然感覺在爭取「安大線」失利, 但透過莫斯科當局巧妙的政治「樞紐」角色運作, 在「泰納線」, 也就是 ESPO 線支線完工開通後, 先行比日本諸國得到原油供給, 給予中國尊重。日本、東亞各國在未來管線開通後, 也得分沾 ESPO 的利益。俄羅斯更得以在未來成功地經由能源強權供給者在亞太區域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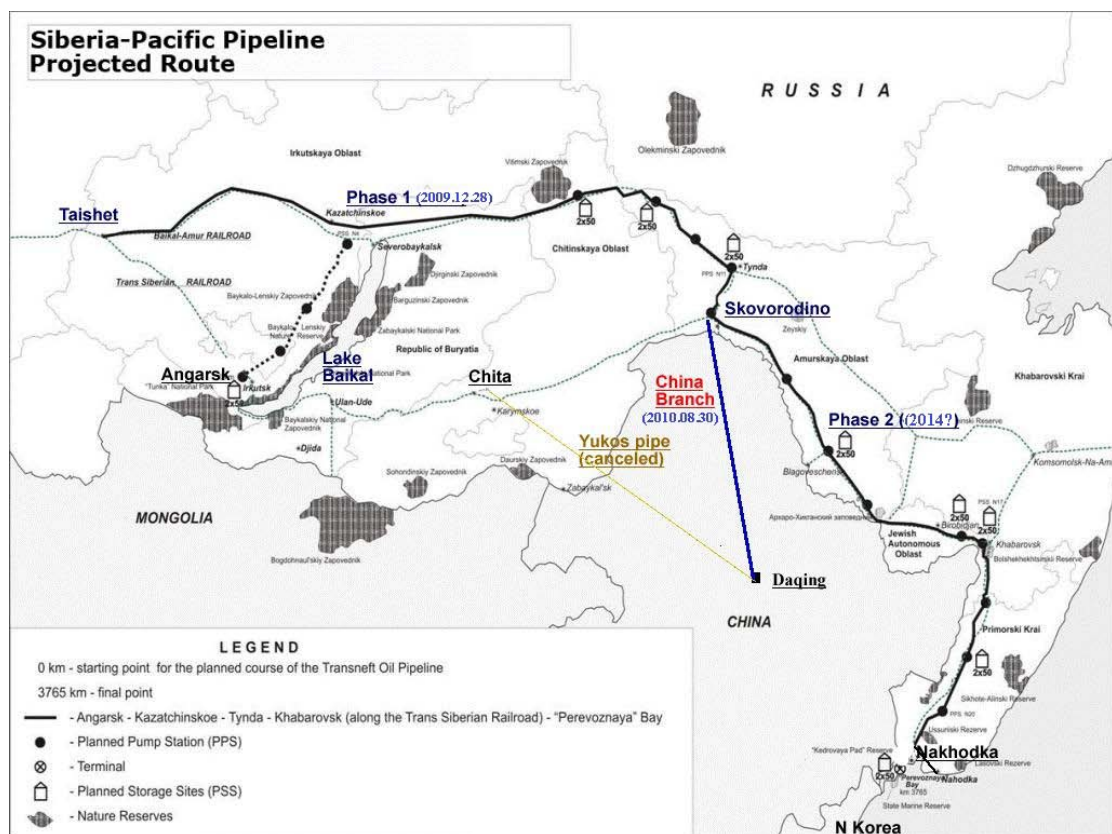


圖 3 俄羅斯 ESPO 計畫路線圖(安大線→安納線→泰納線)

資料來源：茲根據 Leonty Eder, Philip Andrews-Speed, and Andrey Korzhubayev. "Russia's evolving energy policy for its eastern reg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 Business*, 2009, Vol. 2, No. 3, p.233 修改而成。

2. 田灣核電廠

田灣核電站係中俄兩國在核能領域上的高科技合作計畫。位於江蘇省連雲港市連雲區田灣，原本規劃4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並預留4台機組建地，共可建8台機組。第一期工程於1999年10月開工，係建造2台單機容量106萬千瓦的俄羅斯AES-91型壓水堆核電機組，年發電量達140億千瓦時。第一期工程已於2007年陸續完工，並於2007年5月與7月正式啟用。共計1、2號機組運行至2009年6月為止，已發電286億千瓦。第二期工程主要係建造3、4號機組，已於2009年10月開工；另外，第三期工程則係建造5、6號機組，亦已於2010年10月開工。以上每台機組年發電量約可達70億千瓦時，倘若8台機組全建造完成，每年發電量將高達600至700千瓦時，相當於三峽水力發電量的80%，全國總發電量的1.9%(以2009年為基準)。

伍、中俄關係的限制：國內因素

在1960年代末期，蘇聯及中國邊境時常不定期出現小規模衝突，而此種情形在2001雙方簽訂領土協議後出現了雙方可合作的契機，雙方合作的內容包括軍備、科技、經濟甚至外交議題等，然而也有人認為此種親密關係不過是短暫的，此種強烈的連結逐漸消退中。

檢視中俄(蘇)關係的發展，鄰居(neighborhood)因素既是促進兩國發展的有力因素，也是惡化兩國關係的推動因素，也就是說當面對共同敵人時，在外部，也就是國際政治層面上或區域權力體系運作層面上，兩國的「戰略協作」性質就會彰顯(外熱一亦友)，但純屬內部，也就是經濟層面或社會層面上(國內因素)，兩國的鄰居因素就會浮現(內冷一亦敵)，尤其是對於日漸壯大的鄰居的戒備與防範心理，也就是國內安全問題—軍事安全與社會安全(這兩個問題都根植鄰界上)，使得中俄雙方的合作關係仍呈現不甚明確，有時僅有官方表面合作的狀態，因此，兩國的關係呈現懸而未決且不穩定的狀態。

一、中俄軍事安全問題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2月4日表決由阿盟提議的敘利亞計劃決議案，呼籲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下台，以結束該國近一年來的動盪，在安理會表決時中國與俄羅斯則雙雙否決之，中俄在國際舞台再次的聯手出擊，其「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也再度成為國際焦點。中國近二十年內在政經等方面強勢崛起，俄羅斯也逐漸從蘇聯解體的挫敗中復甦，前者擁有強大且成長快速的經濟及軍事體系，後者則有核武及豐富石油天然氣，中俄兩國間的合作，尤其是軍售與軍事技術合作動向，更牽動著亞太地區的戰略安全。

但此前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4 名分別代表芬蘭、英國、美國和中國的專家，於 2011 年 10 月份撰寫了一份題為《中國和俄羅斯在能源和安全領域的關係：希望、失望和不確定性》的報告稱：「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基本上已經停止，傳統的猜疑和累積的輕視致使「中」俄關係中的緊張因素越來越多，兩國戰略夥伴關係面臨許多嚴峻考驗。俄羅斯政治和軍事分析所副所長亞歷山大-赫拉姆奇欣讀後在俄羅斯《軍工信使》週刊 2011 年 11 月 9 日撰文指出，該報告係通過中國人的眼睛看問題，發現「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是“假裝出來的”，他們比俄羅斯政治家、專家和普通民眾更為客觀，俄羅斯人還真的以為「中」俄建成了真正的反美聯盟。

但，中俄間的軍事合作，雖然中俄對於雙方關係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俄國希望從長遠面來看，中俄能從局部合作進展到全面合作，而中國方面更是有：「中俄是永遠的朋友！」¹⁰⁴一說，而 Zbigniew Brzezinski 認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基本上就是個口號，就目前的局勢，事實上，俄羅斯就只能當小老弟(junior partner)，而這是俄永遠無法接受的。」¹⁰⁵Herman Pirchner Jr.(2008)也認為兩者的關係其實是值得存疑的，原因有二：(一) 中國的軍力為俄國的兩倍；(二) 中國曾明確表達在未來將大量提升國防預算，因此「中俄關係就像是在熊抱及微笑背後，藏著不信任及懷疑的心胸」，¹⁰⁶其證據在於中國在 1994~2007 年國防相關花費就成長了四倍之多，¹⁰⁷雖說軍事成長並非一定真對俄國，然而俄國仍舊憂心，因為有許多中國人認為俄國侵佔其土地(東北問題)，而且中國人口過多問題再加上完整領土的概念以即對資源的需求越來越高等因素，都迫使中國與俄國間的關係產生嫌隙。¹⁰⁸

(一)中俄武器出口逐年下降

1992 年 12 月，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了軍事技術合作協議之後，中國開始陸續向俄羅斯購買了大量的武器。雖然其後俄羅斯禁止向中國出口先進武器，但大量的俄羅斯武器已經足以使得中國的武器庫更新換代。俄國防出口公司總經理伊賽金 2011 年 3 月 9 日宣稱，俄武器出口規模連續 11 年增長，2000 年至 2010 年間，俄武器出口由 21 億美元增至 74 億美元，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武器出口大

¹⁰⁴ Colin McMahon, "Russia, China to Sign Friendship Accord," *Chicago Tribune*, March 7, 2001.

¹⁰⁵ Brzezinski, Zbigniew. Scowcroft, Brent. and Ignatius, David, 2009, *America and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p.304

¹⁰⁶ Jeremy Page, "Analysis—China and Russia Kick off New Great Game," *Reuters*, June 15, 2001

¹⁰⁷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110th Cong., 1st S., n.d., 27.

¹⁰⁸ Herman Pirchner Jr., "The Uncertain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kratizatsiya*, Vol.16, No.4, October 2008, pp. 311

國。在 2000-2004 年這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規武器購買國，約佔全球武器交易量的 14%，而其中中國武器進口的 95% 來自俄羅斯，佔俄羅斯總出口武器量的 45%。但是從 2007 年起，由於中國軍隊武器裝備需求的 90% 已經走向國產化，這一指標開始大幅下降，2010 年中國僅占俄武器出口的 10%。在「中」俄軍事技術合作上，由於中國已經擁有大約 300 架蘇-27 和蘇-30 戰機，在幾年前就已不再採購俄羅斯戰機，近年只採購航空發動機和一些特殊軍事產品。

(二) 軍事合作停滯不前

近年俄國防工業技術水準停滯，俄軍自己都已開始從西歐進口武器，相反的中國國防工業系統卻迅猛發展。中國向俄購買軍火的中俄軍事合作關係，由於中方超強的仿製能力，和俄方對中國出口先進武器開始設限，不出售高精密度武器，不轉移相關技術，導致中俄之間的武器交易遇到瓶頸。中方對於武器質量和技術含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俄羅斯能夠向中國提供的武器出口清單越來越少。尤其是，中國對進口的俄國武器系統進行仿製後就出口銷售，俄羅斯已開始面臨中國在第三世界武器市場上的有力競爭，例如中國的 J-11B 和 J-15 戰機就是仿製自俄羅斯的 Su-27 和 Su-33，俄羅斯對中國複製其武器系統當然不滿，因此雙方都放緩了武器交易，以致軍事合作亦停滯不前。

(三) 僅戰略夥伴，無軍事同盟

赫拉姆奇欣在評論瑞典智庫報告時指出：「中」俄關係的表現形式似乎有點矛盾，主要是“最高層的親切”與“草根層的冷淡”對比明顯，中國人不信任俄羅斯，俄羅斯的實力正在衰弱，中國實力卻日益增長，認為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向俄方學習的，雖然兩國領導人和官方反覆強調「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互利雙贏的合作關係，但是實質上，雙方至今仍不清楚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到底是什麼，其基礎和前景又是什麼。中國認為俄羅斯經濟疲軟是兩國合作的障礙，俄羅斯只是中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中國卻是俄羅斯的第一大交易夥伴，瑞典智庫認為，這種失衡的關係將會導致「中」俄戰略夥伴關係迅速崩潰。

中國不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脫離格魯吉亞，並促使上合組織不公開支持俄羅斯，俄羅斯也在通過沒有中國加入的區域組織，如獨聯體、歐洲經濟共同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鞏固自己在中亞的地位和影響力；「中」俄雙方都希望遏制美國，但都認為自己與美國的關係比「中」俄關係更為重要，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國都在對抗美國，但是「中」俄卻都不是美國的敵人；「中」俄雖然宣佈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但是從未締結軍事同盟。總之，「中」俄雖是戰略夥伴關係，但

是這種夥伴關係是現實的，只有在「中」俄利益一致時才會聯合行動。

(四) 邊界安全問題

Yuri Galenovich(Юрий Галенович)認為，中俄在軍事安全領域有著下列隱憂，(一)邊界領土安全問題。對於「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中俄國界西段協定」和「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得到中俄兩國領導人廣泛贊譽的解決中俄領土問題的法律文件，中國民間有著不同的看法，認為在中蘇、中俄邊界問題上，中國承認歷史上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了邊界問題，那麼，基於不平等基礎之上的這些條約就是不平等的，尤其是針對黑瞎子島(Bolshoy Ussuriysky Island, остров Большо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的領土主權問題¹⁰⁹，是中方對俄羅斯的能源需求而屈就的，因此，這三個協定並沒有真正解決中俄邊界與領土問題，中國有可能在未來繼續對爭議領土提出主權要求。故，必須有新的邊界條約形式的法律基礎，以取代現有的所有條約。(二)邊界駐軍問題：對於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國簽署的「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及1997年簽署的「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俄羅斯方面認為這些協定是「不平等」的，因為中國方面仍舊持著要求俄羅斯削減邊界線內100公里區域內的軍隊和裝備的看法，認為俄方的邊防構成了中國的軍事威脅。¹¹⁰

* * *

因此，探討「中」俄軍事合作的前景，應先瞭解「中」俄兩國軍事合作的動機。基本上這可從三種觀點來分析：一種是認為「中」俄軍事合作並不具有深層戰略意義，僅只是兩國之間基於眼前利益而暫時合作，主要由於過去歷史的積怨、邊界的爭議，以及「中國的崛起」所導致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疑慮；第二種觀點是認為，「中」俄軍事合作具深遠戰略意義，是「中」俄兩國基於抗衡美國一超單極，維持全球地緣戰略平衡深具地緣戰略價值；第三種觀點認為「中」俄軍事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轉型期的俄羅斯社會中，各地區、各部門利益，尤其是

¹⁰⁹ 黑瞎子島(Bolshoy Ussuriysky Island, остров Большо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又稱撫遠三角洲、熊瞎子島，是位於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的一個島系，其西半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東半部為俄羅斯聯邦所有。黑瞎子島自1929年中東路事件起，被俄方佔領，一直實行軍事控制，中國失去了實際控制權，2004年10月17日後，中國外長李肇星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 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авров)在北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在原來簽署的《中蘇東段國界協定》、《中俄西段國界協定》的基礎上，確定兩國分割黑瞎子島。姜毅，「中俄邊界問題的由來及其解決的重大意義」，*歐洲研究*，2006年第2期，頁94-107；陳寒溪，「論中國解決邊界爭端的模式—以中緬、中俄關係為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第20卷第3期，2009年，頁48

¹¹⁰ Юрий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Шесть договоров*, М.: Муравей, 2003.

軍工部門利益超越俄羅斯國家整體利益的結果。這三種觀點雖有失周延，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共識，那就是國際環境變遷對「中」俄兩國軍事合作的動力遠大於雙邊的努力與合作動機，換句話說，只要當前國際格局不生變動，「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基調就不會改變，尤其是透過上合組織展現出來的雙方軍事演習與合作關係。亦即，只有在上合組織聯合演習框架內，「中」俄才會展現軍事互信，未來兩國仍需透過上合組織推動軍事合作。

二、 中俄社會安全問題

(一) 「黃禍論」 (Yellow Peril, Жё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¹¹¹ 與俄羅斯遠東開發問題

中俄之間的邊界長達 2264 英里，與中國龐大的人口數相較，俄羅斯位於與中接壤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區卻因嚴重人口外流而導致人口失衡。人口統計的數據顯示，在 1989 年之時，西伯利亞及遠東的人口約有 2 千 9 百萬人，但到了 2002 年只有 2 千 6 百萬人，下降了 8%，尤其是俄羅斯遠東區人口，自 1989 年人口普查以來，1989 年至 2000 年，超過一半的遠東區人口減少 10% 至 60%，有些區域還一年人口負成長 10% 以上。¹¹² 1996 至 2006 年間則有 72 萬名勞動適齡和高素質人力遷出。¹¹³ 相反地，中國卻上升至 13 億人口，人口密度為 130 人/平方公里，而西伯利亞和遠東區卻是 5 人或少於 5 人/平方公里 (遠東區甚至為 1.2 人/平方公里)。¹¹⁴

俄羅斯清楚知道，中國政府會鼓勵漢族移民至內蒙古、西藏、新疆等偏遠地區來鞏固中國的統治，故，令俄憂心的是中國逐漸蠶食俄羅斯邊境的移民現象，

¹¹¹ 「黃禍在俄國起初係指中國人，但 1905 年日俄戰爭後又將日本納入，目的即在於分化日本與西方列強。但追根究底，黃禍毋寧說是阿提拉 (Attila) 肆虐歐洲及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帶給歐洲的夢魘，而蒙古統治俄國亦僅時隔數百年。俄國積極經略遠東始於 19 世紀中期，趁中國內憂外患時攫取大量土地，但也留意到兩國邊界人口的懸殊，如 1897 年俄國人在當地僅有 21.3 萬人，但一線之隔的滿洲卻有 600 萬的中國人。如馬克斯 (Steve G. Marks) 所言，帝俄雖明瞭其遠東戰略的弱點，卻仍擔憂邊界人口失衡，東方游牧民族橫越西伯利亞入侵的可能。黃禍陰霾實影響俄國遠東政策達百年之久。參見 Steve G. Marks,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p. 27; Sarah C. M.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p. 196」; 摘自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08-109

¹¹² Peter A. Fische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ssia", available at: http://migration.ucdavis.edu/ols/fischer_russia.html.

¹¹³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 (Москв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7), с. 11

¹¹⁴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Far East", *Russian Regional Database*, <http://www.abdn.ac.uk/cspp/Far-East-1.shtml>

無論是合法或是非法，俄羅斯境內的中國移民問題¹¹⁵，尤其是西伯利亞和遠東區，都是俄羅斯當權者很嚴重的頭痛問題。¹¹⁶尤其是遠東區產業結構失衡迄今仍在，因為俄羅斯遠東區在過去一直被莫斯科當局視為生產原物料的邊緣地帶，區內還有30%居民之生活低於貧窮水準。¹¹⁷而此肇因於莫斯科當局的主要政策為「在周邊建立友好睦鄰與互利合作地帶」¹¹⁸，開發遠東地區經濟則為第二順位，再加上近年來當地的中國人數目上升了很多，因此，當地「黃禍論」(Yellow Peril, Жё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的疑懼依舊方興未艾，而黃禍論與俄羅斯遠東區之人口失衡所致之領土喪失危機感高度相關。

再者，就中國的人口對於俄國的經濟和安全之影響，俄羅斯認為中國移民不可避免增加了中國經濟對俄國的影響力，尤其是中國慣由賄絡俄羅斯官員的生意模式，更易造成俄國公共財政的問題。俄國對於依賴中國經濟造成的經濟安全問題感到憂懼。¹¹⁹

此外，中俄國境問題也導致了中國東北與俄羅斯遠東區居民的人類安全威脅，「文明間(inter-civilizational)關係比之於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關係」更能展現出該跨境邊區百萬人民的問題與反應出地區間複雜互動的同時，跨境毒品、非法移民、走私貨品、及環境汙染問題接踵而來。¹²⁰

根據全俄輿論中心(All-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VCIOM;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2007年4月16日所做之「俄國人希望與中國友好，但仍有距離」之民意調查，雖然給予中俄關係正面評價(76%)，還是有62%的民眾認為儘管西伯利亞與遠東區勞工短缺，但中國企業及勞工是會對當地的發展中的經濟構成危害，並應加以設限。¹²¹

¹¹⁵ 俄羅斯境內之中國移民可分為三類:1.旅客滯留:有很多辦旅遊簽證進入俄羅斯的中國人，於簽證到期後仍滯留俄羅斯，他們滯留俄羅斯投入建築、伐木、採礦等工業；2. 工作簽證，俄羅斯歡迎有著專業技術，例如建築、農業等的中國勞工，但如想要在俄羅斯市場販賣中國商品並建立「唐人街」市場的勞工，在2007年初俄國新移民法生效後，已大部分被驅逐出境。3.非法移民: 有些中國人會利用不法金錢交易買通邊境而非法入境。其中俄國的勞工短缺亦是一個重要誘因。

¹¹⁶ Herman Pirchner Jr., "The Uncertain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13

¹¹⁷ Christoffersen, Gaye, "Russia's breakthrough into the Asia-Pacific: China's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10 (2010), p68.

¹¹⁸ Иванов И., «Россия в Азии и Азия в Росси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N1, 2004г, с.4

¹¹⁹ Michael Wines, "Chinese Creating a New Vigo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9/23/world/chinese-creating-a-new-vigor-in-russian-far-east.html>

¹²⁰ Larin, V. (2008)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experience, problems, prospects', *Far Eastern Affairs*, 36(2), pp.5-6.

¹²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故，俄羅斯政府為了有效管制中國的移民入境，其主要措施如下：縮短中國人入境簽證的時間；並且要求申請簽證的人須有公家單位的人做保證，如果入境時間超過保證人必須負起責任；政府著手研究中國人口非法滯留之問題；降低冒用旅遊名義申請簽證的機會。

除了致力於降低中國人口數量外，俄羅斯政府亦想辦法提高俄羅斯人的人口數量。冷戰結束後，俄國人的口數下降的很多，儘管有些是口數的減少屬於自然死亡，很多也是因為低生育率，不完善的醫療環境，和經濟不景氣有關係。因此針對遠東地區人口稀少和引發的經濟、安全的問題，普丁在 2007 年發表了一系列的遠東發展計畫，透過 5 千億盧布預算重新分配來改善遠東地區人口過少的問題，主要的政策有三：一、高福利措施：藉由高福利措施，例如免費的交通、免費住屋補貼等，吸引俄國技術人才定居遠東，儘管透過這樣的方式短時間內無法吸引太多的人才，無疑可以提高人口素質。二、提高生活品質：利用聯邦預算來增進遠東地區居民的生活品質，有關當局希望透過提高生活品質讓更多的俄國人願意移居遠東。三、加強基礎建設：莫斯科方面也利用發展西伯利亞的基礎建設，畢竟好的經濟環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當然發展當地工業也是莫斯科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儘管如此，短時間內人口下降的速度還是無法避免。¹²²

(二) 中國威脅？以聖彼得堡「波羅的海明珠」計劃爭議為例

「大家都在討論我們城市裡要建 Chinatown 的事情，我們同事們也很反彈，大家聊到說這樣到時候中國人就會像滿地的蟑螂一樣四處可見...」----- 2006 年聖彼得堡友人的看法

「波羅的海明珠，通過將現代建築符號與大海的完美融合，讓人們充分領略海灣生活的全新品質，會同氣勢恢宏的建築綜合體，共同構建一幅磅礴的歐洲生活畫卷。擁有大海，就擁有整個世界。在這裡白天您可以來到芬蘭灣的海邊，戴上太陽鏡，開啟 mp3，往沙灘上一躺....體驗人居理想的嶄新高度。」----- 計劃官方網站廣告

歷史的發展有時看來是巧合，有時又看來像是世界政經結構的變遷使然。蘇聯解體於上世紀 90 年代末，彼時正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來自世界各地的豐沛外資投入中國，創造了 GDP 的連年高速增長，創造出「世界工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674, 2007/04/16。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cHash=f449ec5302

¹²² Herman Pirchner Jr., “The Uncertain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316-317

廠」，更帶來了技術轉移與產業更新的機會。相對與此，俄羅斯的經濟與產業變化則差強人意。雖然 2000 年後，隨著俄羅斯出口的天然資源在價格與市場上都與全世界接軌，俄羅斯總體經濟看來穩健成長，但工業生產仍未恢復過去的水平。在此背景下，雙方對於彼此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宣稱目前的中俄關係是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歷史上最好的，經貿往來也持續升溫，但不管就歷史上，亦或是國際競爭上，中俄兩國間難免存在比較誰更能提供經濟生活改善的微妙心理。

1. 中國威脅論浮現的背景

隨著對外經濟貿易的快速增長，中國人的身影越來越頻繁地活躍在世界各個地方，國際上關於「中國人口對外擴張威脅」的議論有越來越多的現象。而俄羅斯作為與中國有數千公裏陸地邊境線的北方鄰國，對這種想像中的「威脅」(Kitaiskaya ugroza; Китайская угроза)反映最為強烈，也最有可能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年來不管是俄羅斯官方非正式的意見或是社會輿論的討論，近年來不斷浮現一股有關「中國對俄羅斯進行人口擴張」的莫名恐懼。

這種恐懼通常建立在下面這一不平衡的數量對比上：在俄羅斯遠東地區中俄邊境線的中國一邊，匯聚著成千上萬的滿懷對富裕生活的渴望卻又苦於資源匱乏的中國人；而另一邊，少得可憐的俄羅斯人卻守著資源豐富的廣袤土地。比靜態的數據對比更可怕的是兩國人口互為消長的長期趨勢，中國的人口還在迅速增加，俄羅斯人口卻在持續減少。俄羅斯的中國威脅論最直接的恐懼就變成：「中國人將蜂擁而至，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按照中國威脅論鼓吹者的悲觀預計，可能數十年後，俄羅斯的遠東領土就將被中國移民占領。」¹²³

一份俄羅斯國內單位於 2005 年的調查顯示，有將近 2/3 的俄羅斯人認為，中國人參與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是一種「威脅」；而在它的遠東地區，持這種觀點的民眾比例超過 80%。¹²⁴另外還有部分俄羅斯學者從歷史的詮釋進一步加深了這股恐懼，因為俄羅斯遠東的大片國土在歷史上原本就屬於中國，是清朝末年在當時沙俄帝國的武力脅迫下被迫割讓的。有學者甚至擔心中國政府會因此而支持和鼓勵旨在占據俄羅斯遠東領土的有計劃的移民遷徙活動。據俄羅斯前駐中國

¹²³陳季冰，《人口、資源、環境威脅》，參引自電子版

<http://data.book.hexun.com.tw/chapter-2896-4-8.shtml>

¹²⁴見《俄羅斯怎麼看中國移民》，轉引自 2005 年 9 月 27 日《參考消息》第 16 版。

大使羅高壽回憶，一些俄羅斯高階官員甚至相信「會有 2 億中國人打算遷居遠東，目的就是侵占我們的領土」。¹²⁵

在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下，其內容除了有傳統國際關係定義上的國家安全利益，領土主權爭議，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是生活品質的威脅。就社會學的研究角度觀察，後者就會牽涉到民族甚至種族主義心理的運作機制：如何形構出對異族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依靠對異民族的簡化想像而更確定自己族群文化的邊界，並使得所謂的異族威脅論能引起更多民眾的參與。

一個計劃發想於 2003 年，由上海的投資公司預期標下並建設的聖彼得堡市新市區工程投資項目——「Балтийская Жемчужина(波羅的海明珠計劃)」，所引發的爭議，牽涉到許多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傳統印象包括走私犯，廉價非法偷渡勞工等，並進而聯結到俄中關係下的威脅論情節。本文希望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此一兩國工程投資合作項目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社會互動關係，提供一個新的案例，解釋現代性、社會發展與異族想像的互動角色。例如俄人眼中來自中國的「毒販」和「投資者」呈現的是一種中國人還是多種中國人？而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努力從中國投資計劃下手能否改變另一種中國人形象的存在？

2. 中國資本打造波羅的海明珠計劃

「波羅的海明珠計劃」的中方投資者為上海海外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方總投資達 13.46 億美元，佔地面積達 208 公頃，所在地為聖彼得堡市西南方臨近芬蘭灣的 Красносельский район(紅村區)。整個項目預計從 2006 年起，以 6 到 8 年的時間完成。計劃目標預定該項目完工後可為聖彼得堡市民提供 170 多萬平方米的高水準住宅，可供 3.5 萬人居住，為 1.5 萬人提供就業機會。該項目是迄今為止聖彼得堡市最大的不動產投資項目，並包含住宅、辦公室、旅館、商業中心和其它社會服務設施一應俱全。當時的聖彼得堡市市長馬特維延科 (Valentina Matviyenko) 還在項目奠基儀式上表示波羅的海明珠項目可以比作「中國投資者遞向俄羅斯和歐洲的『名片』」。

該計劃工程是中俄雙方最高層領袖都相當重視的合作項目，所具有的代表意義從高層政治領袖多次參與與參觀此案可見一斑。2006 年 3 月 21 日，在中國國

¹²⁵見《中國究竟是敵是友？》，轉引自 2007 年 3 月 24 日《參考消息》第 8 版。見《羅高壽：中國人是「出色的鄰居」》，載 2007 年 2 月 7 日《參考消息》第 16 版。這樣的恐懼幾乎是百年前類似情緒的翻版。20 世紀初的著名遠東問題政論家梅爾庫洛夫曾出版過一本題為《濱海邊疆區的殖民化問題》的轟動一時的小冊子。在他看來，這一地區未來將無可救藥地被「黃種」勞工所占據，而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平庸無能以及俄羅斯人缺乏適應能力又使得問題更加嚴重。

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共同見證下，投資方、中國進出口銀行與聖彼得堡市共同簽署項目戰略合作協議。2008年5月24日，時任總統的梅德維傑夫在北京大學公開發表了《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基礎在於科技創新》的演講，將「波羅的海明珠」項目選為唯一一個進行重點說明的中國對俄投資實例。這些動作都證明本計劃的指標性。

這個協議不僅給予該項目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品質保證和信譽保障，對於俄中關係發展上更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社會意義。因為它既是迄今為止聖彼得堡市所獲得的最大外資合作項目，也是中方在俄羅斯的最大戰略投資也是最大直接投資項目，堪稱俄中雙方重大戰略性合作項目的新典範。雙方更同步宣稱「波羅的海明珠」重在實現中俄雙方的互利雙贏。

然而，儘管俄方行政官員也公開表示這個項目充分體現了中俄互利雙贏的原則，必將成為聖彼得堡市新的經濟增長點，甚至表達「我們感謝中國投資者所做出的努力」，該計劃案卻在民間引起不少反對聲音，甚至批評俄國地區行政官員根本是被中國利益收買。

3. Chinatown 的形象包袱

這個計劃案從宣布開始，立即就在聖彼得堡市引發不少質疑甚至反對聲音。反對者組織過數次公開性的集會抗議，許多聖彼得堡當地民眾害怕中國人會把「波羅的海明珠」這個社區變成一個封閉的唐人街或中國城。反對者的立論是大量的中國人將會來到聖彼得堡居住，認為中國人會搶了他們的工作。有人甚至稱，中國人的投資是「入侵」。其種一種說法是明顯的歧視，例如有反對者指出「今天讓十名中國人居留聖彼得堡，明天便會有數以百計的中國人擁來」。反對的聖彼得堡市市議員鼓動說「中國人正要利用人口優勢奪取世界」。¹²⁶有民意調查機構展示民調結果，43%人對修建「中國城」感到憂慮。

其實初期的反對者還包括工程建地上原是當地狩獵俱樂部「Балтиец」的用地。另外有些人則是因為珍寶島事件。2005年2月起，反對聲音進一步組織化，在聖彼得堡市有兩個民間組織曾經發起倡議，要求對是否修建「中國城」的方案進行公民投票。同年6月6日，反對團體會見了市議會議員，要求不要通過該計劃案。

¹²⁶ Анна Рудницкая & Татьяна Ромашенкова, Желтый всадник, Огонек, № 36, 5-11/09/2005.
<http://www.ogoniok.com/4910/5/>

按照項目推動主事者的說法，反對聲浪興起是由於文化的差異以及缺乏溝通和了解。中國公司認為反對呼聲高漲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中國方面對工程項目的宣傳不夠，引起了當地人的誤會，俄羅斯民眾不知道「中國人」是為他們蓋房子、建社區，他們反以為中國是要為自己修建萬人大社區，將來會有幾萬中國人住在一起構成威脅；另一方面，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大肆炒作，借此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入侵論」。中國媒體還點名俄羅斯移民局的負責人就公開宣稱，反對在俄羅斯修建「中國城」「對俄羅斯來說，像唐人街那樣的華人聚居區是不可接受的。」。¹²⁷

差不多與它同時開工的同樣由中國企業投資的莫斯科一個商務項目也遭到了類似的抵制，以至於莫斯科市政府官員不得不再三保證，莫斯科絕不會出現「唐人街」。但這些似乎很難說服那些持極端反對意見者，聖彼得堡的一位市議員堅信，「中國人不過是在俄羅斯領土進行曲線擴張。」也有更謹慎的質疑聲音在政治界傳開，俄國公正黨主席米洛範納夫(Sergei Mironov)認為：應該勸導中方投資人，研究一下俄羅斯的市場和官僚程式。「(投資方)也可以包裝成商業行為等等，(國情)如果是透明的，那麼可以文明地認定這是一種政治行動考量。」當時還發生了中國留學生受攻擊事件，中國也有媒體認為可能和該計劃項目引起的反彈有關。

4. 中俄聯手宣傳：「造福」vs.「利潤」

針對當地民眾對中國工程項目的不了解，聖彼得堡市政府和中方公司聯手做了大量工作，希望改變人們的看法，使他們接受「波羅的海明珠」。開發公司首先是加強了對「波羅的海明珠」的媒體宣傳與公關工作。地方電視台和報社記者時常被邀請到工地參觀，介紹「波羅的海明珠」的修建方案；甚至也邀請當地市民到工地參觀，展示和表演社區的管理科技應用。目的是使俄羅斯民眾相信修建「波羅的海明珠」不是來入侵或占領俄羅斯的。中國公司提出的主訊息是：該工程是為聖彼得堡市民造福的，畢竟該工程的唯一效益是為 3.5 萬名聖彼得堡市民提供 100 萬平方米的高水準住宅，創造 1.5 萬個就業機會，還將帶動聖彼得堡房地產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更重要的形象塑造在於工程景觀，中方改變了過去修建「唐人街」的典型思想和做法，在項目規劃過程中，按照俄羅斯人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考慮」

¹²⁷專家認為，對待中國在俄國投資必須認定俄羅斯國家的戰略安全和國情紅線，俄羅斯對待移民的原則是移民數量必須與當地居民人口保持平衡中的劣勢，當移民數量超過當地人口的 20% 時，將會引來沒有理由的重大麻煩，這結果和投資行為如何稱調和工程商業前景無關。

當地人對歐洲生活方式的需求，避免修建成俄羅斯的人不願接受的「唐人街」或「中國城」，所以在工程的命名上，就沒有叫「中國城」，而是採用了與當地地理位置結合的「波羅的海明珠」，據說當地人很喜歡這個改變。最重要的，為了盡一步打消俄羅斯人懼怕「中國城」的心理，中方明確宣示，將來生活在社區裡的中國公民不會超過1%。經過行銷手法的調整後，中國投資方相信，「波羅的海明珠」項目正得到越來越多俄方人士的積極評價。

5. 民族光榮：「他者敘述」中的主體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投資者與政府主控的媒體在這些調整方案下，呈現出何種「中國人形象」。是中國人從過去的文明已走入新文明，外人無需懼怕？還是這個計劃項目中的中國人，和其他地區裡的中國人不同？換句話說，整個計劃案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要在世人面前營造一種特定的中國人形象？如果是，這對俄中關係下的中國威脅論有什麼樣的做樣呢？

以中方的宣傳樣板為例，文宣中總是提及項目的俄方工程師安德烈說，「中國人在項目的建設中既注重對俄羅斯文化與歷史的尊重和傳承，又注重借鑒現代國際規劃設計理念和最新成果。」以及另一位參與的女性俄國工程師阿洛娜說：「俄中雙方在這個項目上的合作讓我感到中國人的真誠。這個項目將把中國優秀的東西帶來，希望這裏能夠成為一個窗口，讓人看到中國經濟騰飛的奧秘。」

甚至有記者的採訪則要強調出，在當地人中間沒有不知道「波羅的海明珠」的，你走在大街上，隨便問一個聖彼得堡人，他們都能對「波羅的海明珠」的事說上幾句，甚至有的人還能發表點看法，真可謂是「家喻戶曉」。因此記者們發現「此次在聖彼得堡了解和聽到的是對「波羅的海明珠」的一片讚揚之聲，無論是從政府領導人的態度，還是從普通市民的回應，都鮮明地反映出他們支持中國興建「波羅的海明珠」、期盼中俄合作成功的願望和心情」。

然而與中方宣傳手法圖顯這是不同以往的中國人形象說法不同，聖彼得堡市建築研究與設計院院長尼吉金(Sergei Nikitin)在中方媒體中主動表示，中國投資的「波羅的海明珠」建築綜合體不但將讓在其中居住的聖彼得堡市民的生活達到「歐洲水平」。但是俄國對尼吉金的採訪得到的結果卻大不相同。在後者裡，尼吉金反而強調中方設計的調整與定位，包括從避免使用中國城意象到使用波羅的海濱度假村形象，以及實際居住品質為歐洲水平是俄國建築師們在與中方合作過程中，辛苦掙去到的改變。所以一方面是順利地排除中國城意象以減少俄國民眾

的排持，在這個商業投資中的合作內容。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中方刻意淡化俄國人角色，以強化顯現中國文明水平「已能走出中國」。

在條款與保證的背後，中國方面的真實想法也突顯這個「俄中關係典範」其實隱含著許多巧妙經營的手段。中國記者表示上述 1% 條款，限制中國人在此居住將不到 400 人，事實上是表現出波羅的海明珠項目的協議中有「一條歧視性的奇怪條款」。由此可見，所謂的受歡迎的，展現中國經濟優勢的這個「中國工程」，並不是一個民族展現，而是一種雙方謹慎對話下的產物。

(三)、中俄經貿區域合作：從圖們江地區開發計畫看俄中間潛在矛盾

本節主要內容為俄羅斯對圖們江地區開發計劃的態度與政策的特徵。但在分析圖們江地區具體開發問題之前，首先有必要探究這個合作項目在兩國關係框架下的定位與含義。

1. 俄中區域合作的重要性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儘管俄中兩國在國際關係上經常被視為非正式的盟友，而實際上確實通常相互支持共同應付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但莫斯科與北京國際戰略合作具有比較明顯限制。例如，2008 年俄羅斯政府正式宣佈承認外高加索喬治亞的南奧塞梯和阿佈哈茲作為獨立國家之際，中方並非表態。後來普丁總理對此事表示，他能夠理解中國的立場。由此可見，莫斯科與北京相當清楚，對方的支持是不可能超越某種底線。

既然雙方對這一點有「默認」，對兩國關係構成最大的挑戰並未戰略夥伴合作之事，而是兩國經貿與區域合作的問題和矛盾。雖然這些問題不太可能在短中期內對俄中兩國關係產生明顯影響，但隨著問題增多，為了適應新局面，莫斯科與北京將早晚被迫對雙方關係加以調整。

再者，在涉及兩國經貿和區域合作的問題上，除了中央政府之外，還有地方政府和兩國財團的利益是不可忽視的。換言之，雖然俄中兩國是權威政權，但由於兩國經濟已轉向市場經濟，政府在決策和執行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社會上不同勢力的要求。

俄中兩國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推動的圖們江地區開發項目的歷史雖然相當長久，但令人失望的是其結果仍不明顯。因此筆者認為，此案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說明兩國基層合作的問題和限制。

2. 圖們江地區開發項目：俄羅斯的態度與交通建設問題

毫無疑義，圖們江地區開發項目是中國區域合作政策重要組成部分。對東北亞而言，圖們江地區開發計劃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因此中國一直比較重視此計劃。比如，2009年8月30日，國務院批准「中國圖們經區域合作開發規畫綱要--以長及圖為開發開放先導區」¹²⁸，這是中國政府批准的、第一個延邊開發開放區域規劃，這也等於說中國中央政府已將圖們江地區開發項目上升到國家戰略。

在圖們江區域合作計劃中，俄羅斯憑藉地理位置（圖們江下游15公里是俄朝界河；俄羅斯濱海邊區的東方港、納霍德卡港、海參崴港是整個東北亞重要大港）和林業、漁業、礦物資源等優勢被認為具有重要地位的參與之國。但與中國十分積極態度相比，俄羅斯一直採取極為謹慎的立場。

1995年9月，俄羅斯濱海邊區官員宣佈，濱海邊疆區已經開始實施由聯合國制定的圖們江流域經濟開發計劃。即便如此，俄羅斯的態度一直猶豫不決。專門研究此一問題的中國大陸學者胡亞西和祖立超指出，「自圖們江區域合作開展以來，俄羅斯對該項目的政策經歷了由消極對待到謹慎參與的演變過程」¹²⁹。

值得一提，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俄方的確更為樂意參與圖們江區域合作。例如，2008年8月，普丁總理批准了支持大圖們江區域開發的政府協議，並責成有關部門為共同基金提供資金15.9萬美元，較2007年增加近三倍¹³⁰。儘管如此，雖然隨著俄中關係改善，俄羅斯對圖們江計劃也更為積極，俄國政府也表示支持中國就“大圖們江地區”的倡議，但實際上兩國對務實合作內容和重點始終持有不一樣的態度，其中交通建設問題最突出，因為無論對中國東北還是俄羅斯遠東地區而言，這種關鍵問題將直接影響到其經濟和社會發展。

1993年，俄政府總理切爾諾梅爾金視察濱海邊區表示，圖們江自由經濟區不是俄羅斯經濟發展的重點。與此同時，俄羅斯設立了納霍德卡自由經濟區、海參崴自由經濟區，東方港、海參崴港、扎魯比諾港和波謝特港被確定為自由貿易港，但這實際上是為加強俄國在遠東地區的貨物運輸優勢而採取的措施。

¹²⁸ 按照「規畫綱要」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市部分區域和延邊自治州成為中國圖們江區域的核心地區。

¹²⁹ 胡亞西、祖立超：“俄羅斯在圖們江區域合作中的地位與政策。”// 國際資料信息，2008(09)，第2頁。

¹³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5 августа 2008 № 1245 <http://www.businesspravo.ru/Docum/DocumShow_DocumID_141715.htm>.

1998年，俄羅斯對外貿易部駐俄羅斯沿海省納霍德卡港自由經濟區負責人爾克坡負（Vladimir Arhipov）公開表示，目前俄方最關心的是本國的經濟發展問題，他舉例子說，蘇聯時代，沿海省的東方港（位於納霍德卡港以東，是西伯利亞鐵路亞太地區的末端）年貨物吞吐量曾達二十二萬五千公噸，到90年代末則下降至六萬公噸。所以爾克坡負認為，俄羅斯不能關注支持中國或朝鮮的鐵路和港口擴大改善的問題，必須先照顧自己¹³¹。

2001年2月，俄羅斯交通部副部長切力郭（Aleksandr Celko）表示，目前俄羅斯交通部最重視的是西伯利亞鐵路與朝鮮半島鐵路網絡連接的問題¹³²。從這個聲明來看，俄羅斯最關心的並非圖們江地區開發計劃和有關的交通走廊的發展，而是要盡可能加強本國作為自然的歐亞大陸東西交通走廊的地位和作用，保證將來從東亞運往歐洲的集裝箱依然以西伯利亞鐵路為主要交通工具，或至少使西伯利亞鐵路具有能與中國大陸所提出的新歐亞大陸橋競爭的能力¹³³。俄羅斯鐵路集團與朝鮮已達成最後協議，其主要內容為俄方負責完成哈桑-羅津鐵路建設項目並獲權在羅津港租賃第三號碼頭¹³⁴。

儘管到2012年俄方已基本上完成鐵路的建設，而且開始修建碼頭基礎設施，但是最近在南韓和俄羅斯媒體出現的消息證明中方並不願意將具有戰略意義的羅津港讓給俄羅斯。據報道，中國三家公司聯盟（其中包括中國國立駐香港的招商局集團）已與朝鮮政府簽署協議，準備壟斷羅津經濟事業，並將以各種手段擠出在羅津港租賃碼頭的其他公司（包括俄羅斯鐵路集團）¹³⁵。由此可見，由於雙方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發展計劃和目標不同，而且隱含競爭的一面，羅津港將有可能變成俄中區域性的矛盾焦點之一。

3. 雙方合作絆腳石何在？

圖們江地區開發項目一直很難達預定目標的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俄羅斯與中國在圖們江地區開發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從外交戰略來看，兩國政府對東亞區域合作與經濟整合有截然不同的

¹³¹ Come back in five years. Economist, 00130613, 06/27/98, Vol. 347, Issue 8074；另參考：張玉山，譚紅梅（2010）。“新形勢下中國圖們江區域開發的機遇與挑戰。” 東北亞論壇（03）：14。

¹³² А. Иванов. МПС выходит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ынок.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02.23.

¹³³ Е. Васильева. Транзит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01.13.

¹³⁴ И. Михайлов. РЖД возьмет участок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й дороги в концессию.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141. 2008.08.12; РЖД выведет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из изоляци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 181. 2008.10.07

¹³⁵ О.Кирьянов. Китайцы "выдавливают" РЖД из КНДР.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2.08.16.

看法。有些中國專家一直主張，對俄羅斯而言，與東亞各國加強經貿合作最理想的方式是要積極參與圖們江地區開發計劃¹³⁶，即以中國為中介人加入東亞地區合作。但俄羅斯作為世界上大國未必能夠同意這種看法。對俄羅斯對東亞戰略而言，保留歐亞大陸橋國家的獨佔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將來與東亞各國和區域性組織進行談判的時候，莫斯科便可利用這個王牌，以更為順利加入東亞地區合作機制。

第二，從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來看，西伯利亞鐵路一直扮演關鍵的角色。從十九世紀末到蘇聯時代，莫斯科將西伯利亞鐵路和其分綫視為遠東地區發展基礎和骨幹。如果中方能夠完成由俄羅斯赤塔經由吉林省通往俄羅斯濱海邊區港口的鐵路主幹發展計劃，那麼俄羅斯遠東地區很可能會失去過境集裝箱運輸訂單。這對原本經濟不太發達的濱海邊區可能造成致命衝擊。

總而言之，儘管最近幾年圖們江地區開發計劃再度升溫，但因為本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俄羅斯與中國仍然無法對東北亞區域合作方向達成共識，各有所圖，所以圖們江地區發展前途並不容人樂觀。

陸、上海合作組織對中俄關係的影響：機制化平衡工具抑是權力角逐場？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原為「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其成員為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中共。上海五國原僅係一個論壇性質的機制，其主要目的係用來處理中蘇兩國之邊界、軍事及邊境裁軍問題，五國元首曾於1996年於上海會晤，每年定期開會一次。上海五國於1999年底開始走向機制化，從原先的定期元首會晤機制，發展成多邊合作組織，並建立各層級的晤談機制。2002年7月，上海五國於塔吉克首都杜尚別(Dushanbe)舉行第五次會晤，各國強調將深化在政治、外交、經貿、軍事、科技之合作，以維護區域安全與穩定，此外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及極端主義，定期召開五國邊境、執法、海關及安全部門首長會議，並視情形舉行反恐軍演。¹³⁷上合組織建立後，中俄雙方不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交流異常密切，單是2011年迄今雙方高層即已進行10次互訪，創下歷年來雙方高層互訪的高峰。創下歷年來雙方元首會面的高峰。幾次會面中，對於愈趨密切的「中」俄關係，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皆強調，兩國高層頻繁互訪足以顯示兩國相互依存度日趨升高，關係密切，有利於

¹³⁶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俄羅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5頁。

¹³⁷ 閻英華，「上海五國機制的回顧與展望」，當代世界，第8期(2000年)，頁9-11。

促進兩國深入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近二十年來中俄關係已從友好的、建設性的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進入中俄前所未有之友好高峰期。但、上海合作組織是否為中俄關係之機制化平衡工具抑是權力角逐場?以下分析之。

一、中俄關係之機制化平衡工具觀點

(一)社會認同的形成—反恐、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作為下的敵我認同

911 事件爆發後，反恐行動不僅成為全球安全的首要任務，亦間接促成了上合組織的建立。2001 年 6 月，上合組織正式成立，同時亦通過《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及極端主義公約》，對於反恐、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作出法律上的界定，並為打擊這三股勢力提供法律上依據。¹³⁸2002 年 6 月，六國的元首於聖彼得堡高峰會上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2004 年 1 月則啟動上合組織的秘書處與地區反恐機構。此外根據 2005 年 7 月通過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各成員國堅決反對一切恐怖主義、方法與活動，而打擊恐怖主義應合乎國際法規範，無「雙重標準」。¹³⁹自 2002 年開始，上合組織成員國舉行了多次雙邊或多邊的聯合軍演，並以 2002 年 10 月 10 日的中共與吉爾吉斯邊境聯合軍演為濫觴，而後迄今除了 2008 年未舉行聯合軍演外，幾乎每年皆舉行反恐軍演，茲將歷次反恐軍演之內容整理如表下：

內容 次數	名稱	日期	內容
1	演習—01	2002/10/10-11	中國和吉爾吉斯兩國邊防部隊和特種部隊，於中吉陸路口岸兩側邊境的高山地區進行聯合軍演。
2	演習—2003	2003/8/6-12	中、哈、吉、俄、塔五國共 800 人，包括吉特種分隊，於新疆伊寧地區和哈薩克斯坦烏洽拉爾市進行聯合軍演。

¹³⁸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in.mid.ru/dip_vest.nsf/99b2ddc4f717c733c32567370042ee43/d47c905a825e19a2c3256aa20025b879?> (July, 2001).

¹³⁹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06068.htm>>，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 年 7 月 5 日）。

3	和平使命 —2005	2005/8/18-25	中俄參演兵力近萬人，其中中方參演兵力8000 餘人，於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國山東半島及附近海域進行聯合軍演。
4	協作—2006	2006/9/21-23	500 多人，包括中方 1 個特戰連和塔方摩步連、特戰連和炮兵營各 1 個，於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穆米拉克訓練場舉行聯合軍演。
5	和平使命 —2007	2007/8/9-17	中、哈、吉、俄、塔、烏六國武裝力量，中方參演兵力 1600 人，於中國烏魯木齊和俄車裡雅賓斯克切巴爾庫爾合成訓練場舉行聯合軍演。
6	和平使命 —2009	2009/7/22-26	中俄雙方參加實兵演練兵力各 1300 人，於俄哈巴羅夫斯克、沈陽軍區洮南合同戰術訓練基地舉行聯合軍演。
7	和平使命 —2010	2010/9/9-25	哈、中、吉、俄、塔等五國參演部隊聯合投入 5000 多名兵力，於哈國阿拉木圖市及奧塔爾市的 <u>馬特</u> 布拉克訓練場舉行軍演。
8	天山—2 號	2011/5/5-8	中塔吉三國於中共新疆喀什舉行軍演。
9	和平使命 —2012	2012/6/8-14	哈、中、吉、俄、塔等五國參演部隊聯合投入 2000 多名兵力，於塔吉克胡占德市舉行軍演。
資料來源：「上海合作組織大事紀」，上海合作組織， < http://www.sectsco.org/CN/Yolder.asp >（2012 年 8 月 20 日）。			

上合組織的反恐軍演，主要目的在於防止美國藉由反恐之名將其實力深入中亞地區，因此上合組織的「反恐」並非以反恐為主要目的，而係一種保衛自身在中亞地區戰略利益的實際作為。如此的反恐作為將造成反恐的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排除外在勢力於區域內的防恐作為，區分區域內的「我們」與區域外的「他們」，逐漸形成一種區域內外的敵我認同。而在上合組織的數次聯合軍演中，亦可看出已中俄為首的「和平使命」系列軍演已逐漸形成一種定期性的機制，在中俄的反恐軍演中，雖以反恐為名，實則尚包含了上合組織成立的幾種目的：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由於中俄雙方同時面臨到疆獨、藏獨、車臣的分離主義，且在西方人權組織不斷的壓力下，中俄兩國已逐漸形成一種反分離主義

陣線上的敵我認同，區分為堅決反對打擊分離主義的「我們」與非堅決反對打擊分離主義的「他們」。

(二)專屬財產與社會認同促進同盟關係的穩固

在專屬財產與社會認同形成後，中俄關係日趨密切。單是 2010 年雙方元首即已進行 2 次互訪六次會面，創下歷年來雙方元首會面的高峰。幾次會面中，對於愈趨密切的「中」俄關係，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都強調，兩國高層頻繁互訪足以顯示兩國相互依存度日趨升高，關係密切，有利於促進兩國深入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1 年中俄雙方高層互訪亦高達五次，足以說明當前的中俄關係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熱絡期。

表 10、2010 年中俄元首會面一覽表

次 數 內容	日期	內容
1	2010/4/15	胡錦濤於巴西利亞會見梅德韋傑夫，就重要區域與國際問題交換意見。
2	2010/5/9	胡錦濤訪俄於莫斯科會見梅德韋傑夫，就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進一步發展交換意見。
3	2010/6/10	上海合作組織召開塔什干峰會，胡錦濤會見梅德韋傑夫。梅德韋傑夫稱期待秋天訪華。
4	2010/6/26	胡錦濤於加拿大多倫多參加 G20 峰會，並會見了梅德韋傑夫，討論進一步發展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5	2010/9/27	梅德偉傑夫赴北京與胡錦濤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共同出席原油管道工程竣工儀式和多項合作檔的簽字儀式，並共同發表二戰勝利 65 週年聯合聲明。
6	2010/11/11	胡錦濤在首爾參加 G20 峰會，並會見了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就推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向前發展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二、中俄關係之權力角逐場觀點

在九〇年代為了解決中亞邊境問題而促成俄羅斯、中國與中亞各國的「上

海五國」(Shanghai Five, Шанхайская пятёрка)會晤機制，進而在 2001 年 6 月 15 日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標榜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和對外開放原則，而上海協定也同時產生，主要目的是用來對抗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安全與經濟合作機制，且排除了美國參與的區域合作組織，在兩大強權—中、俄的主導下，上海合作組織可說是中俄兩國在中亞利益的維繫，雖然中、俄兩國在中亞的利益有所重疊與衝突，尤其在國家安全、經濟和能源方面。

安全、能源與威望三大因素支配莫斯科的中亞政策，而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和威望利益為中國中亞政策的主要考量。在安全方面，中俄兩國互有利益，但俄方稍帶敵意，因為一直以來，俄羅斯即視中亞為其「後花園」，是其勢力範圍，中國與美國勢力進入中亞，使其安全備感威脅，而在中國方面，將中亞視為「緩衝區」(buffer zone)，除了可防止中亞諸國和俄羅斯介入新疆和西藏問題，還可擴大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無需分心關注中亞，而能全力關注在臺灣與南海問題上。而在能源利益方面，中俄兩國是競爭敵手，俄羅斯如能將中亞能源整合至其能源戰略內，勢必強化俄羅斯在世界能源市場的競爭力，反之，如讓中亞能源脫離俄羅斯的掌控進入中國或西歐，俄羅斯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但在中國方面，中亞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具有產品市場，原料供應，尤其是能源利益最為重要，因此，中國積極尋求與中亞建立油氣管線連繫；而在威望方面，中俄兩國目標一致，兩國接意圖以該機制作為其多極化格局的施力槓桿，因為 2001 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軍進駐中亞，此對中、俄所主導之「上海合作組織」而言，是一極為嚴重的全球與區域戰略挑戰，而俄羅斯更欲藉「上海合作組織」振興其在中亞的威望，因此，兩國互為表裡，相互支援，「上海合作組織」是中俄兩國制衡美國勢力入侵中亞的重要戰略機制。¹⁴⁰

中俄兩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較大的衝突點，在於經濟層面。2001 年 9 月 14 日阿拉木圖(Almaty, Алматы)的高峰會裡，中國為其在中亞的經濟和能源利益，有意將該組織導向經濟和貿易上的區域合作組織。但，「上海合作組織」在短期內轉變為經濟型的區域組織並不是俄羅斯政府所樂見的，俄羅斯與中國在中亞的經濟發展上本來就存在許多衝突與矛盾，在俄羅斯經濟方面，害怕中國的經濟霸權會掌握「上海合作組織」大部分的控制權，利用中國便宜的商品去影響「上海合作組織」各會員國的市場，進而導致中亞會員國和俄羅斯在經濟上必須大量依賴中國。再者，俄羅斯一直拒絕以國家資金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項目撥

¹⁴⁰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 3 期，2005 年 5-6 月，頁 140-150

款，因為俄羅斯的財政能力無法與中國抗衡。¹⁴¹因此，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多由中方主導，俄方反而在經濟合作議題上持不合作態度。

俄羅斯的態度其來有自，他認為經濟整合是必要的，但那是長遠的計畫，並不是短期內就可以達成，在此時俄羅斯認為只有經濟體系類似的前共產國家才可以一同在經濟上整合，且俄羅斯在此階段必然為整合的領導者，而非中國，因此，俄羅斯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期望和目標還是主要放在政治和區域安全為主。¹⁴²

柒、 中俄關係的機遇與未來：兼論對台啟示

一、中俄關係未來發展爭議

中國和俄羅斯在 1990 年開始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但是目前很多不同的聲音卻認為現今中國與俄國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艱難，而且會在未來十年到十五年之間因為中國在遠東的擴展面臨到很多政治和經濟的對抗，現歸類以下三個兩國會面臨爭議的議題，而美國只能影響到最後一個議題。

(一) 俄羅斯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兩國政治和軍事領導的能力是決定性的因素。兩國最主要的問題為：俄國會發展遠東的經濟，增加當地人口，防禦遠東，避免中國的垂涎嗎？或者中國的胃口會因為俄國在遠東的俄國居民逐漸減少，而中國居民逐漸增多而加快擴張嗎？

俄羅斯於亞太地區，最重要且最直接的伙伴就是中國，中國對於俄羅斯的亞太目標與遠東區經濟發展皆有加成或抵制的效果，雖然兩者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聲稱不針對第三者，但，很明顯的，北韓事件之六方會談、中俄聯合軍演、ESPO 線的架設，都顯示出俄羅斯想重回冷戰當時中美俄戰略三角的關鍵性地位，¹⁴³而對於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相對的也不甘示弱，積極地想以能源來作為雙方關係的籌碼與支柱。但，中國從經濟危機的影響中能夠更快地得以復蘇，同時也看到它與地區和全球強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影響力日增；俄羅斯則擔心，莫斯科方面沒有能力在經濟上與中國競爭，甚至已經開始擔心俄羅斯在政治上最終也會被北

¹⁴¹ 鮑樂維，「綜論大選後俄羅斯外交暨中國政策的外來發展趨勢」，*台灣東北亞研究季刊*，2008 年冬季號，頁 90-92

¹⁴² Kazantsev, Andrei,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Sea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60, No.6, 2008, pp.1079 -1080

¹⁴³ Gilbert Rozman, "Russia in Nor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ed. Robert Legvo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43-92.

京方面降格到「小老弟」(junior partner)的地位，而這也是俄羅斯在中俄關係中，最無法接受的一點。

(二) 台灣議題

雖然俄羅斯在國際發言公開支持中國的「一個中國」的論點，但在台灣問題的立場上，暗地裡也是受中俄邊界問題的影響，對於兩岸問題是希望兩岸間維持現狀。如果中國覬覦俄國的領土，那麼當中國與台灣統一之後，俄國就會產生危機，因為中國會重回 1858 和 1860 年從俄國損失領土的問題，這會導致中國從福建調遣軍隊到東北並且對俄國施壓允許更多的中國移民移入中國，因此，在台灣的議題上，中俄是不同調，俄羅斯認為只要台灣能維持現狀，中國就不會測試中俄邊界的底限。¹⁴⁴

(三) 美國政策

David Kerr(2005)認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字面意義遠大於實際性質，雖然，其關係的產生與美國之冷戰後的單邊外交政策走向息息相關，但與美抗衡另一層意義就是願意負擔實際成本，這意味著不僅是國內資源重新定向的成本，也包含著引起霸權不滿的成本。¹⁴⁵，

雖然美國最主要的政策目標不是影響中俄關係，但是美國對兩國的立場態度會影響到兩國關係。當美國保證協防台灣，中國就會與俄國友好並且揚言發動台海戰爭。又或者當美國提倡未來 NATO 應該加入喬治亞和烏克蘭，就會鼓勵俄國與中國合作，使美國對喬治亞和烏克蘭的影響減少。因此如果美國不介入前蘇聯的領土和其他緊張議題，如俄羅斯導彈防禦系統、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宣稱，那麼就會減少中俄的合作機會。

二、中俄關係發展對台灣的啟示

中俄關係的發展對於台灣方面的啟示與影響，可分兩方面說明，其一為經濟面，其二為國際安全面。

¹⁴⁴ Chenghong Li, "Limited Def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ino-Russi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driving for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6, No.52, 2007, August, pp.495-496

¹⁴⁵ David Kerr,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5) 49, 411-437

(一)經濟面

俄羅斯的對台政策始於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 1992 年 9 月所簽署的《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俄羅斯聯邦同臺灣關係的命令》，以及同年中俄所簽署的《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在這些文件中，俄羅斯聯邦明確地宣示了不會與臺灣建立官方關係的「一個中國」政策與立場。1998 年 11 月在中俄元首會晤時，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宣佈了俄政府對台的「四不政策」，主張俄方不支持臺獨、不接受「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不向臺灣出售武器。普丁執政後的對台政策依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在中俄關係的影響下，俄台之間的互動僅能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非官方的交流上低調、穩定地發展。

在台俄貿易開放後，雙方貿易額便持續成長，由 1993 年的 7.14 億美元，到 2011 年 38.78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然而基於地緣以及投資環境因素，雙方的互動仍無法達到理想的水平，俄羅斯為我國第 25 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占我國整體外貿比重為 0.66%；俄羅斯是我國第 25 大出口市場，我國對俄出口額占整體出口比重 0.49%；俄國是我國第 23 大進口來源，自俄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 0.84%，顯示彼此之間的投資或貿易量與自身的經濟規模不成比例，兩國貿易往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俄羅斯於今年 8 月 22 日成為 WTO 成員，這為台俄經貿關係的提升提供了一項利多的契機。俄羅斯與國防工業相關技術的商業化，將是俄羅斯加入 WTO 後的新經濟發展重點，台灣廠商擁有商業化與製造強項，有機會在俄羅斯加入 WTO 後發揮長才。此外，由於俄羅斯對中亞、東歐等前蘇聯區域仍具有影響力，故俄羅斯可成為推動歐亞市場貿易的重要角色，發展涵蓋中亞、北亞、東歐的區域經濟。因此俄羅斯入世之後，一方面資訊電子產品將逐年降低進口稅率至零，不但對我國廠商有利，也可藉由宏碁、華碩、宏達電、鴻海等已在莫斯科、聖彼得堡設立行銷及生產據點的大廠之經驗，進一步拓展周邊中亞、烏克蘭等市場。

(二)國際安全面

中俄兩國關係由於上合組織的出現而日益密切，其背後實潛藏著大國權力的對抗與制衡，中俄兩國之所以成立上合組織，最初即是用以制衡 911 事件後，不斷以反恐之名將觸角伸入中亞地區的美國。而當前中俄之間密切的同盟關係亦將牽引著東亞局勢的發展，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卡特於近期即曾表示，未來幾年內，美軍於亞太地區艦隻數量占美軍總艦隻數量的比例將從目前的 52% 增加至 60%，其中包括淨增一艘航空母艦，使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航母數量達到 6 艘。美國此舉

主要係針對軍事實力不斷竄升的中共予以制衡，而美方更透過美日與美韓安保條約以實施軍演的方式來呼應以中俄為首的上合組織反恐軍演。由於我國地理位置夾雜在兩股勢力之間，更應關注最新區域局勢的發展，以達到「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效果。

捌、 結論

根據 2011 年中共外交白皮書指出，中國外交正同時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與難以預料的困難挑戰。中國將以「五個意識」作為外交政策運作上的指導原則：大局意識、憂患意識、機遇意識、統籌意識及服務意識，藉以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並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創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該文並分別從經濟外交、峰會外交、安全外交等七個方面，對中國外交在過去一年的表現加以總結。此外，多年來中國外交的主要目的係為促進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不僅全力為國家「保穩定、促發展、調結構」服務，更致力與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十一五」規劃相對接，與各相關政府部門協調合作，以政促經。透過積極參與解決金融危機的國際合作，化危機為轉機，並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實施「引進來」、「走出去」戰略及建設自由貿易區，促成對外重大合作項目。

賀凱(Kai He)所提出的機制化平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整合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並按經濟互賴之強弱將制度性平衡分為排他性平衡(inclusively balance)與包含性平衡(exclusively balance)兩類。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意義於是在促成一排他性的均勢抗衡，尤其是在外部威脅夠強大時自然出現需求。不過當敵我分際趨於模糊或是威脅來源趨於多元化時，國家為了避險則會先穩固一方，避免腹背受敵，則盟友的選擇標準則可能取決於理念與價值是否相近，此時平衡則融入於制度性結構中成為包含性平衡。此時國家之間的關係與地位是透過規範與規則予以限制或合法化，並且在多邊機制的框架內，透過議題的設定與討論滿足個別或共同國家利益。而機制化平衡有別於傳統注重硬平衡(hard balancing)的權力平衡理論，將軟平衡(soft balancing)納入研究範圍。軟平衡常被現實主義學者用來解釋冷戰後，單極體系下的國家透過非軍事的方式來制衡美國。由於中俄關係發展至今，已非傳統的權力平衡所能解釋，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合作密切，使得更離不開使用軟平衡來分析雙方的合作以及對美國之制衡，更由於中台俄關係合作的多元層面，本研究案透過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利益觀及社會建構主義的認知觀，以機制化平衡與分析折衷主義結合後之新模型(圖 2，頁 19)探討中台俄在各層面的變遷複雜關係，凸顯本研究的創新性。

在權力面上，由於中俄都不願見到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中俄雙方皆主張多極化，反對單邊主義，因此中俄近年更加主動、積極地介入全球事務，擴大其在全球的影響力。如與歐美國家的會晤機制相較，中俄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訪與會晤機制，顯示出兩國關係已進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後續的發展亦值得吾人觀察。

在利益面上，美國陸軍作戰學院教授布蘭克(Stephen Blank)曾指出，自 1990 年以來，由於俄羅斯經濟情勢嚴峻，無法兼顧遠東地區(Russian Far East)的經濟開發，只好與中國合作共同開發西伯利亞，並與北京當局對黑龍江省的開發計畫相結合，中國甚至向俄租賃土地予國內農民耕種。此外，由中方貸款鋪設的「東西伯利亞—太平洋天然氣管線」(East Siberia and Pacific Ocean Pipeline)更由俄方在未來 20 年內以天然氣資源償還本息，造成俄羅斯難以發揮在亞洲地區經濟上之影響力。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透過一系列具有企圖心的政策，來尋求亞洲新的金融與安全秩序，藉此獲得其經濟發展所需的大量能源及設備投資，中國因而成為亞洲經濟與安全上的新領航者。顯然布蘭克的說法與 2011 年中國外交白皮書所提及的將全球金融風暴視為外交上的機遇與重建經濟秩序方面不謀而合。

在認知面上，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下，專屬財產與社會認同產生，進而使中俄關係愈形穩固，無論中俄雙方的原始同盟動機為何，同盟關係的穩固將是未來主要趨勢。

整體而言，回顧中俄兩國關係史，歷史上尚未任何一個時期像現今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如此緊密。冷戰後全球戰略環境面臨重大變遷，美國的一超獨霸與北約的東擴，使得中俄兩國在國家生存發展上彼此互相需求與互補，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而中俄兩國領導人的互訪與會面頻率亦達前所未見高峰，俄中雙方領導人會談重心，係從全球戰略高度出發，面對當前變遷中多極化與全球化的世界，強調國家間日益加強的互賴情形，加強「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合作關係，開放合作、互惠雙贏，以建立兩國的共識。而兩國總理的定期會晤機制，則係針對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來落實兩國所簽訂的各項合作，以及深化兩國睦鄰合作，此外，在國際層面上，更繼續互相支持對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領土的完整。

再者，俄中經貿合作發展快速，而且彼此尚有諸多仍未開發之經貿空間與機會。兩國間都有意願建立中、長期的發展計畫促進與擴大雙方的交流能量。相關計畫旨在改善雙邊貿易，強化機械、技術與電子產品的貿易流通，尋求改善經濟

合作、提升投資與在不同領域中實施計劃的最佳方式。兩國皆鼓勵能源領域的合作，其中也包括核能的和平用途的發展合作，航太研究、新金屬、化學、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及通訊等等的發展。俄中經貿合作係建立在雙方共同利益之上，雙方也都有意願建立彼此互惠互利的夥伴關係。因為有上述這些主觀的因素，中俄兩國的經貿合作應可在穩定秩序中持續成長。

但是中俄關係的問題癥結點在於中國威脅論。關於中國威脅論，從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分析的角度，我們看到的是政治領袖與智庫在戰略關係上的博弈，或是自然資源與金融資本間的交換考量。但是，關於所謂的民族想像在很多場域中，是一種社會互動下的產物，甚是將形成多種「中國想像」，若未能發現其過程的力量，那麼由上擷取新現象下的所謂中俄關係，很容易陷入取其「名」而未知其「形」的盲點，因此，中俄社會間的「黃禍論」或「中國想像」，如僅靠上層菁英的制度性互動而意欲降低俄羅斯社會對「中國威脅論」的制式想法，這僅是中俄關係的表面功夫，對於實質中俄關係促進的影響有限。

中國和俄羅斯在建立起戰略伙伴關係初始，曾引發一些西方分析人士的懷疑。正如英國智囊機構歐洲改革中心的俄羅斯和中國問題專家羅鮑波 (Bobo Lo) 所說的，俄羅斯和中國其實只存在有限度的伙伴關係，並沒有什麼戰略伙伴關係。他說，儘管雙方關係近年來有顯著改善，但這種伙伴關係卻基本上是建立在所謂「擱置不信」(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之上，也就是雙方儘量淡化差異。以經貿為例，俄羅斯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所佔市占率不足 2%；而中國在俄羅斯的貿易總額中也只佔 6% 的比重。兩國其實都在朝「西方」看：歐盟佔據俄羅斯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中國對歐美經貿的倚重自不待言。¹⁴⁶

相對於中國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對歐美所採取的軟性外交政策，俄羅斯不可能也不願意和中國一樣，為了獲取自身的利益而奉承的與美國建立關係。而面對中國的崛起，中國在東亞、中亞，以及歐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再發展下去可能會迫使美國接受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權勢。因此，如果美國未來反過來為了抗衡中國，摒棄政治考量與俄羅斯建立關係，那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將會出現極大的變數，這對於東亞與世界的局勢又會帶來另外一番風雨欲來的態勢，值得後續追蹤與觀察。

¹⁴⁶ Bobo Lo "The long sunset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Russia's evolving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2, 2004, pp.295-309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 中國評論新聞網，「中俄聯手拋棄美元，抗衡美霸權」，2010年12月1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7/101525753.html?coluid=2&kindid=4&docid=101525753&mdate=1201221647>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中俄合作—合作簡介—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http://ru.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004/20100406868045.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統計—中國與歐洲國家貿易統計表，
<http://ozs.mofcom.gov.cn/date/date.html>
- 吳大輝，「尋找理想與現實間的平衡點：如何對待中俄關係中的摩擦」，**國際經濟評論**，2004年第3期，頁18-20
-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1997
- 李靜杰，「試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東歐中亞研究**，1997年第2期
- 李靜杰，「跳入新世紀的中俄關係」，**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7年第2期。
- 李承紅，「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現狀、問題與對策」，**俄羅斯研究**，2009年第1期，頁87-116
- 宋鎮照、張子揚、楊鈞池、洪敬富、馬祥祐、許菁芸、張義東、蔡育岱合著，**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新秩序—變動中的亞太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
- 江澤民，「共創中俄關係的美好未來——在莫斯科大學向俄羅斯各界知名人士發表的演講」，**中國經濟網國務院公報**，2001/07/17
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
- 姜毅，「中俄邊界問題的由來及其解決的重大意義」，**歐洲研究**，2006年第2期，頁94-107
- 洪美蘭，「俄羅斯的國際貿易活動—兼論其與中國貿易關係之發展」，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慶祝創系八十周年「國際政治經濟學與金磚四國」研討會，2010年10月22日，
- 新華網，「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1992年12月28日)」
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27/content_642356.htm
- 新華網，「中俄互換《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2005/06/0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

新華網，「溫家寶在中俄建交 60 周年慶祝大會暨中國『俄語年』閉幕式上的講話」，2009 年 10 月 14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0/14/content_12226503.htm

張鐵鋼，「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瞭望新聞週刊*，第 25 期(2001 年)，頁 3-5。

馮紹雷，*普京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月)。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轉型中的俄羅斯對外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俄羅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 3 期，2005 年 5-6 月，頁 125-160

關貴海、樂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9 年)。

閻英華，「上海五國機制的回顧與展望」，*當代世界*，第 8 期(2000 年)，頁 9-11。

陳寒溪，「論中國解決邊界爭端的模式—以中緬、中俄關係為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09 年，頁 46-50

劉蕭翔，「俄屬遠東『黃禍論』之論析：迷思或事實」，*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07-141

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關係 50 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年)。

鮑樂維，「綜論大選後俄羅斯外交暨中國政策的外來發展趨勢」，*台灣東北亞研究季刊*，2008 年冬季號，頁 77-109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九卷第三期，2008 年 7 月，頁

二、 英文部分

Andrew Andrews-Speed, Xuanli Liao, Roland Dannreuth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BC News. "Yukos case against Russia begins at European court". 4 March 2010.

<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8549226.stm>

Br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 1998) pp. 146-147.

- Brooks, Stephen G., William C. Wohlforth, “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1(4), 2002, pp.20–33
- Cohen, A., “The Bush-Putin Summit Agenda: Russian Peacekeepers for Iraq?”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September 19, 2003,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3/09/Old-The-Bush-Putin-Summit-Agenda-Russian-Peacekeepers-for-Iraq>
- Christoffersen, Gaye, “Russia’s breakthrough into the Asia-Pacific: China’s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10 (2010), pp.61–91
- Cooper, Richard N., *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 Daniszewski, John, “Far East Void Eats at Russia,”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 2001.
- Ethier, Wilfred J.,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yst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
- Ferguson, Joseph P., “Russia’s Rol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 *NBR Analysis* , Vol. 14, No.1. 2003.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nalysis/vol14-no1/index.html>
- Fischer, Peter A.,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ssia”, available at:
http://migration.ucdavis.edu/ols/fischer_russia.html
- Frolov , Vladimir, and Andrey Seregrin, “The Multipolarity Trap: How Russia Should Make Friends...and with Whom?” *Moscow Defense Brief*, N: 2, 2007 , pp.20-25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2.
- Grieco, Joseph M., “Anarchy and the Limited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2.
- Haggard, Stephen, & Simmons, Beth A.,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495-496.
-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and In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 492.
- Hasenclever, Andreas, Mayer, Peter, & Rittberger, Volk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erman Pirchner Jr., “The Uncertain Future: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kratizatsiya*, Vol.16, No.4, October 2008, pp. 309-322
- Holsti, K.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3)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Huntington, Samuel,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35-49
- Judt, Tony, “A New Master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Anti-Americanism,” in Tony Judt and Denis Lacorne eds., *With Us or Against U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Katz, Mark, “Primakov Redux? Putin’s Pursuit of Multipolarism in Asia,” *Demokratizatsiya*, Vol.14, No. 1, Winter 2006, pp. 144-152
- Kazantsev, Andrei, “Russia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Sea Reg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60, No.6, 2008, pp.1073 — 1088
-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s a European-American Research Programme,”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Keohane, Robert O.,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err, David,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5, Vol. 49, No. 4, pp. 411–437
- Krasner, Stephen D.,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arin, V. (2008)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experience, problems, prospects’, *Far Eastern Affairs*, 36(2), pp.1–17
- Leonty Eder, Philip Andrews-Speed, and Andrey Korzhubaev. “Russia’s evolving energy policy for its eastern reg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 Business*, 2009, Vol. 2, No. 3, pp. 219-241
- Li, Chenghong "Limited Def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ino–Russi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driving forc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16, No.52, ,2007, August, pp.477–497
- Li, Jingjie, “ 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in Sherman W. Garnett, ed., *Rapprochement of Rivalry?-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 Lieber, Keir A., & Alexander, Gerard,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 110.
- Lo , Bobo “The long sunset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Russia’s evolving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2, 2004, pp.295-309
- Mackinder, Halford J.,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2), pp. 71-114.
- Marcus, J. ,“Kosovo and after: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0.
- Marks, Steve G., “Conquering the great east,” in Stephen Kotkin and David Wolff eds.,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 pp.23-39
- McMahon, Colin , “Russia, China to Sign Friendship Accord,” *Chicago Tribune*, March 7,2001.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opf, 1960).
- Morse, Edward L.,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 Paul, T.V., “Introduction: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ing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V. Paul, James J. Wri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age, Jeremy, “Analysis—China and Russia Kick off New Great Game,” *Reuters*, June 15, 2001
- Paine, Sarah C. M.,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 Pape, Robert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No. 1, (Summer, 2005), pp. 20-21.

- Rozman, G. (2008)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ussian Far East: a resurgent Russia eyes its future in northeast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5(1),36–48.
- Rozman, Gilbert, "Russia in Nor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ed. Robert Legvo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43–92
- Russo-Chi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Now 'At an Unprecedented High Level,'" *ITAR-TASS*, October 16, 2001.
- Simon, Sheldon,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2, (1995), pp. 5-24.
- Simoniia, Nodari, "Russian East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Global Asia* 1, no. 1 (2006) pp.71-79 http://globalasia.org/pdf/issue1/Simonia_GA11.pdf
- Snidal, Duncan,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p. 4-11
- Tow, William,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Vladimir Ivanov, "Russia's Energy Politics: Focusing on New Markets in Asia," (symposium,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New Paradigms for Transpacific Collaboration, Vol.16,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October 16–18, 2006)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 Book 2005: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110th Cong., 1st S., n.d., 27..
- Wines, Michael, "Chinese Creating a New Vigo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9/23/world/chinese-creating-a-new-vigor-in-russian-far-east.html>
- Waltz, Kenneth 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 McGraw-Hill, 1979)
- Waltz, Kenneth N.,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5-41.
- Wendt, Alexander,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Winter, 1994)

- Wohlforth, William,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91-129.
- Wu, Yu-Sha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 Studies*, no. 1 (March 2009): 117-162
- You, Ji,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28, 2001, pp. 387 - 398
- Zagoria, Donald 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三、 俄文部分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Россияне хотят дружить с Китаем, но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Пресс-выпуск No.674, 2007/04/16 ◦

http://wciom.ru/arkhiv/tematicheskii-arkhiv/item/single/4399.html?no_cache=1&сНаsh=f449ec5302

Витковской Г. и Д. Трени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межстранов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Гендальф, 1999).

Гельбрас, В. "Китайский общий рынок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6,6/ 2002.

Гранберг, А. Г. "Сибирь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Китай • Харбин, 2001.

Гусаров, Е. П. *Росси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96*,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Гусейнов, Р.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округа в Росс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Китай • Харбин, 2001.

Думова, И. И. "О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Ирку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Китай • Харбин, 2001.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яя в

-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5, с.44-62,
- Иванов И., «Россия в Азии и Азия в Росси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N1, 2004г, с.2-5
- Иванов,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Статьи 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 2002).
- Задохин, А.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2002).
- Ковалева, Г. Д.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Сибири и регионов Кит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Китай • Харбин*, 2001.
- Михеев, В. «Экономика Китая: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Экономист*, №5, 2002.
- Санеев, Б. Г.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кооперация между азиатскими регионами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ам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Китай • Харбин*, 2001.
- Титаренко,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внутренне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в оценках*,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2008).
- Титаренко,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МИД России, 2002).
-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Китай • Харбин*, 2001.
-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 года» (Москв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7)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出國報告

一、研究主題：中俄關係二十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二、行程

2012年9月6日至12日前往中國大陸，選定中國大陸俄羅斯研究南北兩大重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與北京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此行時間點適逢俄羅斯舉辦APEC年會，相關學界議題亦在討論：俄羅斯將"重返亞洲"。

三、訪談對象

9月11日訪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兼國際關係與地區研究院院長)等

9月8日訪問北京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前所長李委員靜杰(現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等

四、行程成果

有關研究主題：中俄關係二十年：權力利益認知的資料蒐集相當有收穫，對本研究案有很大助益。其中例如北京社科院與俄羅斯社科院於今年六月在莫斯科所舉辦的「中俄關係二十年」研討會論文資料，未對外公開，但此行順利完整蒐集，對中俄雙方總結過去二十年關係，取得相當重要與寶貴資訊。此外並走訪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與該所幾位研究員晤談，包括中俄關係學會會長李靜杰(前所長)、李建民研究員，歐洲所張健雄等。對該等研究所近年研究環境、薪資與研究經費大幅增加，深感中國大陸對爭奪國際事務話語權，相當努力，投入亦係前所未見，印象深刻。

走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對其所兼任之國際關係與地區研究院所屬研究所與中心，近年能與中國銀行合作，接受委託研究幾個大型研究項目，研究經費超過人民幣一千萬元，其中包括俄國史教科書之重寫，國際關係理論之建構等，有些主題研究有後來居上之勢，相當值得我們在台灣的學術研究單位警惕。

五、行程研究貢獻

計畫主持人本次的出國訪查的研究貢獻有二：

(一)了解中俄關係的走向與東亞局勢未來發展，有利於台灣發展自身定位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復甦和國力增強，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極欲再扮演昔日

大國角色。近年來，俄羅斯的全球戰略尤其是與美、中關係發生明顯變化。在中俄關係上繼續深化雙邊戰略夥伴關係，911 事件後至今，更以上海合作組織反恐名義，雙方舉行多次聯合軍演。由於中俄都不願見到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中俄雙方皆主張多極化，反對單邊主義，因此中俄近年更加主動、積極地介入全球事務，擴大其在全球的影響力。計畫主持人除了透由學者訪談對中俄雙邊互動關係政策等議題進行更深一層之研究外，亦就出果訪查成果評估未來雙邊關係走向，尤其是中俄關係走向複雜的制度化平衡之相關研究。

因此，本出國訪查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與貢獻之一，為探討自1991 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一超單極，中俄雙方走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近十年來，隨著中國崛起與俄羅斯逐漸恢復國力，以及美國國際影響力下降，中俄關係發展因各自存有不同的利益意圖，而朝向複雜的制度性平衡發展的實際內涵。

崛起中的中國要突破及制衡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與俄發展戰略夥伴關係成為最有利選擇。美國對於近年爆發的中日釣魚台爭端、南海海域主權爭議及南北韓的延坪島事件上動作頻頻，也成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關注的焦點，因此中俄關係的走向成為國際政治研究者不能忽視的議題，在此今日兩岸關係日益趨近的同時，有利於台灣發展自身定位。

(二)俄羅斯加入 WTO 後，台俄關係再深化之政策建議

2012 年俄羅斯加入 WTO 對中俄對雙邊經貿合作的挑戰，也相對的是台俄間雙邊經貿關係的契機。例如，隨著關稅降低和市場開放，俄本國企業生存壓力增大，其運用世貿規則特別是提出反傾銷訴訟的可能性也將增加。

在台俄貿易開放後，雙方貿易額便持續成長，由 1993 年的 7.14 億美元，到 2011 年 38.78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然而基於地緣以及投資環境因素，雙方的互動仍無法達到理想的水平，俄羅斯為我國第 25 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占我國整體外貿比重為 0.66%；俄羅斯是我國第 25 大出口市場，我國對俄出口額占整體出口比重 0.49%；俄國是我國第 23 大進口來源，自俄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 0.84%，顯示彼此之間的投資或貿易量與自身的經濟規模不成比例，台俄兩國貿易往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俄羅斯於 2012 年 8 月 22 日成為 WTO 成員，這為台俄經貿關係的提升更提供了利多與合作的契機。

俄羅斯與國防工業相關技術的商業化，將是俄羅斯加入 WTO 後的新經濟發展重點，台灣廠商擁有商業化與製造強項，有機會在俄羅斯加入 WTO 後發揮

長才。此外，由於俄羅斯對中亞、東歐等前蘇聯區域仍具有影響力，故俄羅斯可成為推動歐亞市場貿易的重要角色，發展涵蓋中亞、北亞、東歐的區域經濟。因此俄羅斯入世之後，一方面資訊電子產品將逐年降低進口稅率至零，不但對我國廠商有利，也可藉由宏碁、華碩、宏達電、鴻海等已在莫斯科、聖彼得堡設立行銷及生產據點的大廠之經驗，進一步拓展周邊中亞、烏克蘭等市場。

而最後是從俄羅斯加入 WTO 和加入東亞整合過程，以台灣安全的角度去審視中台俄關係的變化與未來發展契機，希望可以提供給台灣有關方面政策決策參考，也可讓台灣方面了解東亞權力重組後，台灣要思考的東亞定位，提出台俄關係再深化之政策建議，因此對台灣來說，俄羅斯的商機無窮。由於中俄雙方快速成長的經貿關係，使得未來至中國大陸發展的台商或台灣人才須加深對俄國的認識，甚至須學習俄文來因應所需。這也是本計畫之主要貢獻之二。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出國報告

一、研究主題：中俄關係二十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二、行程

2012年9月6日至12日前往中國大陸，選定中國大陸俄羅斯研究南北兩大重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與北京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此行時間點適逢俄羅斯舉辦APEC年會，相關學界議題亦在討論：俄羅斯將"重返亞洲"。

三、訪談對象

9月11日訪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兼國際關係與地區研究院院長)等

9月8日訪問北京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前所長李委員靜杰(現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等

四、行程成果

有關研究主題：中俄關係二十年：權力利益認知的資料蒐集相當有收穫，對本研究案有很大助益。其中例如北京社科院與俄羅斯社科院於今年六月在莫斯科所舉辦的「中俄關係二十年」研討會論文資料，未對外公開，但此行順利完整蒐集，對中俄雙方總結過去二十年關係，取得相當重要與寶貴資訊。此外並走訪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與該所幾位研究員晤談，包括中俄關係學會會長李靜杰(前所長)、李建民研究員，歐洲所張健雄等。對該等研究所近年研究環境、薪資與研究經費大幅增加，深感中國大陸對爭奪國際事務話語權，相當努力，投入亦係前所未見，印象深刻。

走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對其所兼任之國際關係與地區研究院所屬研究所與中心，近年能與中國銀行合作，接受委託研究幾個大型研究項目，研究經費超過人民幣一千萬元，其中包括俄國史教科書之重寫，國際關係理論之建構等，有些主題研究有後來居上之勢，相當值得我們在台灣的學術研究單位警惕。

五、行程研究貢獻

計畫主持人本次的出國訪查的研究貢獻有二：

(一)了解中俄關係的走向與東亞局勢未來發展，有利於台灣發展自身定位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復甦和國力增強，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極欲再扮演昔日

大國角色。近年來，俄羅斯的全球戰略尤其是與美、中關係發生明顯變化。在中俄關係上繼續深化雙邊戰略夥伴關係，911 事件後至今，更以上海合作組織反恐名義，雙方舉行多次聯合軍演。由於中俄都不願見到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中俄雙方皆主張多極化，反對單邊主義，因此中俄近年更加主動、積極地介入全球事務，擴大其在全球的影響力。計畫主持人除了透由學者訪談對中俄雙邊互動關係政策等議題進行更深一層之研究外，亦就出果訪查成果評估未來雙邊關係走向，尤其是中俄關係走向複雜的制度化平衡之相關研究。

因此，本出國訪查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與貢獻之一，為探討自1991 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一超單極，中俄雙方走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近十年來，隨著中國崛起與俄羅斯逐漸恢復國力，以及美國國際影響力下降，中俄關係發展因各自存有不同的利益意圖，而朝向複雜的制度性平衡發展的實際內涵。

崛起中的中國要突破及制衡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與俄發展戰略夥伴關係成為最有利選擇。美國對於近年爆發的中日釣魚台爭端、南海海域主權爭議及南北韓的延坪島事件上動作頻頻，也成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關注的焦點，因此中俄關係的走向成為國際政治研究者不能忽視的議題，在此今日兩岸關係日益趨近的同時，有利於台灣發展自身定位。

(二)俄羅斯加入 WTO 後，台俄關係再深化之政策建議

2012 年俄羅斯加入 WTO 對中俄對雙邊經貿合作的挑戰，也相對的是台俄間雙邊經貿關係的契機。例如，隨著關稅降低和市場開放，俄本國企業生存壓力增大，其運用世貿規則特別是提出反傾銷訴訟的可能性也將增加。

在台俄貿易開放後，雙方貿易額便持續成長，由 1993 年的 7.14 億美元，到 2011 年 38.78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然而基於地緣以及投資環境因素，雙方的互動仍無法達到理想的水平，俄羅斯為我國第 25 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占我國整體外貿比重為 0.66%；俄羅斯是我國第 25 大出口市場，我國對俄出口額占整體出口比重 0.49%；俄國是我國第 23 大進口來源，自俄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 0.84%，顯示彼此之間的投資或貿易量與自身的經濟規模不成比例，台俄兩國貿易往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俄羅斯於 2012 年 8 月 22 日成為 WTO 成員，這為台俄經貿關係的提升更提供了利多與合作的契機。

俄羅斯與國防工業相關技術的商業化，將是俄羅斯加入 WTO 後的新經濟發展重點，台灣廠商擁有商業化與製造強項，有機會在俄羅斯加入 WTO 後發揮

長才。此外，由於俄羅斯對中亞、東歐等前蘇聯區域仍具有影響力，故俄羅斯可成為推動歐亞市場貿易的重要角色，發展涵蓋中亞、北亞、東歐的區域經濟。因此俄羅斯入世之後，一方面資訊電子產品將逐年降低進口稅率至零，不但對我國廠商有利，也可藉由宏碁、華碩、宏達電、鴻海等已在莫斯科、聖彼得堡設立行銷及生產據點的大廠之經驗，進一步拓展周邊中亞、烏克蘭等市場。

而最後是從俄羅斯加入 WTO 和加入東亞整合過程，以台灣安全的角度去審視中台俄關係的變化與未來發展契機，希望可以提供給台灣有關方面政策決策參考，也可讓台灣方面了解東亞權力重組後，台灣要思考的東亞定位，提出台俄關係再深化之政策建議，因此對台灣來說，俄羅斯的商機無窮。由於中俄雙方快速成長的經貿關係，使得未來至中國大陸發展的台商或台灣人才須加深對俄國的認識，甚至須學習俄文來因應所需。這也是本計畫之主要貢獻之二。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10/23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中俄關係20年: 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計畫主持人: 郭武平
	計畫編號: 100-2410-H-343-008- 學門領域: 國際關係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郭武平		計畫編號：100-2410-H-343-008-					
計畫名稱：中俄關係 20 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2	5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5	5	100%		
		專書	3	3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1	1	100%		
		博士後研究員	1	1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